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它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 译 者 说 明

有着长期的多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当通过什么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这是迄今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还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欧洲共产主义”就是意大利等一些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在探索这条道路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思潮。

本书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包姆访问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那波利塔诺的谈话记录。那波利塔诺是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机构成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也是意共的研究经济理论问题的权威。在这篇访问记中，他以具体生动、通俗易懂的语言，回答了有关意共的路线和对内对外政策、“历史性妥协”的战略以及意共对美国和苏联的态度等许多问题。这对于我们了解意大利共产党当前进行的斗争和“欧洲共产主义”道路，很有参考价值。

本书是根据英国劳伦斯·希尔公司一九七七年出版的英译本翻译的。

一九八一年四月

## 原出版者的话

《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享有国际声望的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包姆访问意大利共产党经济问题发言人乔治·那波利塔诺的谈话汇编。第一次谈话时间为一九七五年十月一、二日在罗马。霍布斯包姆和那波利塔诺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九日再次在伦敦交谈。这份材料把第二次谈话同第一次谈话合并在一起，刷新了第一次谈话的内容。

本书集中论述西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大的政治发展——欧洲共产主义的兴起。书中提出的问题有：

——新的政治现实如何影响美国同意大利的关系？

——一九七六年的意大利大选有什么重要意义？

——什么是“历史性妥协”？

——意共首先效忠于莫斯科还是效忠于意大利和北约组织？

——意共提出什么样的经济纲领，党如何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工作？

——意大利共产党今天的实力有多大？

## 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那波利塔诺答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包姆问

埃里克·霍布斯包姆（以下简称霍）：在开始以前，我想问一件事：你是否以意共书记处书记的身分回答我的提问？可否请你澄清这一点？

乔治·那波利塔诺（以下简称那）：我并不总是代表党讲话。自然，我将尽量考虑我们集体所做的一切，但我首先将努力根据党内我这一代人的经验来回答你的问题。

霍：好，那末我们就从你的个人经历谈起。看来这样做很有好处。你是怎样参加共产党的？思想上起过哪些变化？

那：我是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期间参加共产党的。我刚进大学时，正值法西斯统治的最后危机时刻，我已经“发现了”共产党，但当时我的主要倾向还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意共奠定了发展成为群众性的党的基础。在北方是通过抵抗运动——解放战争的烈火奠定的。在意大利南方（这一点值得强调一下），这一进程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实现的。不论在北方还是南方，来自小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知识界的青年也参加了共产党。在意大利南方，作出这样的选择是有扎实的政治和精神基础的，是同法西斯垮台以及盟军解放这一地区之后的形势密切关联的。

对于我们这些在那不勒斯或其它南方地区参加共产党的人来说，党首先是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一支最不妥协的力量。当时党在游击运动中站在抵抗斗争的最前列。即使在南方，党已经参加了政府，它仍一直在进行斗争，推动大家团结一致，为解放仍被纳粹占领的意大利北方而战。由于意大利共产党是以苏联为首的伟大世界运动的一部分，它的形象就更为突出。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苏联进攻纳粹军队所取得的英勇业绩和辉煌胜利，具有巨大的和非凡的吸引力。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认为我们参加意共的最重要的原因，应当说是由于共产党在力求解决法西斯遗留下来的严重问题（特别是在南方）方面所起的作用。

霍：意共对这些问题采取什么对策？

那：人们确实应当好好地回忆一下一九四四年陶里亚蒂返回意大利时那不勒斯及南方的局面。几年后陶里亚蒂写过一篇十分精采的证词，叙述当时那不勒斯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这个城市已经四分五裂，集南方一切落后因素之大成，到处是战争造成的废墟，一片荒芜景象，极其触目惊心。

在政治上如此落后的南方，怎样才能使局面改观呢？在北方，劳工运动经过抵抗运动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地位；而在南方，不论是城市（甚至象那不勒斯那样的大城市）还是在农村，反动势力的影响仍占统治地位。在我们许多人的心目中，共产党是最能保证实现彻底变革、同时又为解放和重建我国而实现最广泛团结的一支力量。在南方看来，它最有条件着手改革，在政治与社会方面进行恢复工作和促进广大人民群众逐步提高觉悟。意共本着这样的前景和目标，一俟陶里亚蒂返回意大利后（多亏他给意大利政治指出方向），就担负起政府职责。

我们同时感到个人也需要全力投入重建和革新工作，这在当时那不勒斯和南方的条件下是十分艰巨的。当时有许多年轻人象我一样，来自小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知识界，他们感到必须抛开个人打算，以及在文化或专业上的抱负，全心全意地献身于工人阶级政党。这就是我们靠拢意共的政治和精神基础，至于思想修养则是以后的事了。

霍：南方青年是如何接受意大利劳工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都灵传统”<sup>①</sup>的呢？

那：党内一些经过考验的第一流领导人，过去也是南方的青年知识分子，可以说起了十分重要的桥梁作用。他们有过反法西斯斗争的经历，坐过牢，被流放并流亡国外。这些经历使这批青年人同那些出身工人阶级、具有“都灵传统”的领导人在组织上结合在一起。我指的是象乔治·阿门多拉和艾米利奥·塞仑尼这样的人。北方一解放，他们就负责党在意大利南方的活动。他们无疑是新一代南方共产党人和党的全国领导人之间特别重要的纽带。党的全国领导人当时多半仍扎根于象你所说的“都灵经验”之中，他们是葛兰西<sup>②</sup>在都灵培养出来

<sup>①</sup>“都灵传统”或“都灵经验”，是指1919—1920年意大利都灵市工人，在葛兰西等人领导下进行工厂和成立工厂委员会的运动（参见本页关于葛兰西的注）。——译者

<sup>②</sup>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1913年，葛兰西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917年当选为都灵社会党总支部书记。十月革命以后，他吸取了俄国革命的经验，在意大利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1920年领导都灵工厂苏维埃的革命运动，并创办了《新秩序报》，后来就在该报周围形成了社会党内的共产主义派别——“新秩序派”。1921年，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等共产主义者在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者决裂而成立了意大利共产党。1922年，葛兰西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6年，他被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府逮捕，监禁达十一年之久，备受折磨，出狱不久即病逝。葛兰西在其战斗的一生中，著有不少重要著作，最有代表性的当推《狱中札记》一书。葛兰西的思想对意大利共产党的方针路线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对当前“欧洲共产主义”思潮也有很大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欧美不少国家出现了研究葛兰西著作的热潮。——译者

的。

应该说，在陶里亚蒂领导下的全党领导（他们一部分人解放战争时期在北方工作，一部分人则已经到了南方）是吸引我们和鼓舞我们的信心的巨大源泉；我们对它几乎达到盲目崇拜的地步。它代表了共产党人在历史上反法西斯斗争（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欧洲）的献身精神。同时，它也表明意大利共产党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血肉关系。

霍：你说你的思想修养是入党之后才开始的。我看这完全合乎常理。一般总是先在政治上入党，然后在思想上和理论上提高。

那：另一方面，在三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甚至在秘密入党之前，在理论上就展开了热烈的争论。我特别是指罗马的一批人，我能回忆起来的有路契欧·隆巴多·拉迪切，阿尔多·纳拉利，保罗·布法利尼以及后来的马里奥·阿利卡塔，皮特罗·英格拉奥。努力在思想上同党同心同德也是入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我们则是在一种十分激动人心的形势下参加党的，是在感情比较冲动的情况下参加党的。

霍：你入党后在理论上和思想上有哪些发展阶段？

那：我应该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上“工人阶级学校”。现在这么说可能象是讲漂亮话，但当时在那不勒斯这样的城市，党的核心确实是工人干部。对我们来说，这的确是个相当严格的学校。我们的主要活动是学习在工作中遵守纪律，了解工人阶级的问题和劳工运动的问题，使我们能够成为能干的政治干部。我可以说，我们当中许多人是谦虚认真地根据这种要求而努力的。

至于谈到我们思想文化方面的修养，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我是指党多年来在这方面的一贯立场而言。党基本上要求

我们在两个不同的领域进行工作。一个是同传统文化，特别是同传统的南方文化建立联系，既同这种文化的进步方面建立联系（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要求建立这种联系），也同这种文化的更复杂的理论方面建立联系。对于后者，我们需要采取严格的批判态度。其次是意大利的历史、南方的历史和意大利的文化传统。葛兰西的《书信集》和《狱中札记》出版之后，我们从中得益非浅，受到很大鼓舞。

我们的另一项任务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那就是学院式地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特别是学习马列主义最刻板 and 简单化的解释，著名的课本有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联共（布）党史》等。

因此，在党的文化工作中，从而在我们每个人的思想和文化教育中，同时存在着两种大不相同的活动。不过也要承认，我们这些较年轻的党员，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两种文化教育存在着矛盾。实际上我们察觉到两者之间的矛盾是过了好久以后，是在批评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教条主义的歪曲和批评斯大林主义时期在文化政策上阻止发展的典型作法之后。

霍：到现在为止，我们着重谈的是解放斗争时期，因为以这个时期为起点，对意共进行分析是合乎逻辑的。不过我认为党在这个时期之前的历史并不是一脉相承的，但在解放以后，它的发展基本上是连贯的。在回顾意共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发展情况之前，先谈谈这样一个问题看来是重要的，即：你和你这一代人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入党时，究竟有哪些历史遗产、具体形势和经验影响党的发展。

那：我同意你的意见，回顾一下形成意共和当时政策的历史过程是很重要的。强调一下在法西斯垮台后立即出现的一个特殊方面是正确的（我这样作是把这方面看成是意共的一个



基本特点)。意共是作为一支主要的民主力量、自由和民主的真正价值观念的捍卫者出现的。尽管其它政治力量和主要思想派别怀疑共产党的民主性质，或者怀疑它的民主任务的真诚性，但我们知道，它已经在事实上表明了它的信仰和它以最有效的方式为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斗争作出贡献的能力。

然而，那时候我们并不完全意识到，要使共产党成为争取自由和民主斗争的最坚定的捍卫者，会遇到多么大的困难。

霍：对不起，打断你一下。自由和民主是美好的，但是你们当时想的不也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吗？

那：在那个年代象我这样加入共产党的青年人，没有一个怀疑最终目标应当是社会主义，应当是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变革。但是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的近期目标看来是解放仍在纳粹占领下的北方，在这之后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国家。我们要求建立一个进一步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和变革的民主政权（陶里亚蒂称之为进步的民主政权）。不过我还要再说一下，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而是过了好长时间以后才懂得争取进步的民主政权这一近期目标有多么困难。也许这是一个你所感兴趣的问题。

霍：是的，这恰恰是我的问题所在。

那：意大利共产党是各国共产党中第一个被迫同法西斯对抗、切身体验劳工运动败在法西斯手中的滋味，并且不得不从事长期艰巨的探索，以寻求反法西斯的有效斗争形式。我认为当时的那种特殊历史环境对意共和它以后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好几年，只有意共一家饱经沧桑，虽然这个问题理所当然地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讨论的一个议题。意大利共产党是第一个被迫经受这种可怕的经历并留下了痕迹。即使今天，要是不回顾意共的历史，我们就无法懂得为什么意共与众

不同。它曾经不得不同法西斯进行较量。

只是到了三十年代，法西斯和反法西斯斗争的问题才成为整个欧洲的普遍问题。我们知道，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在共产国际内部进行过多次复杂的争论。在著名的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前，共产国际内部早就存在着相反的立场。而在意大利党内，可以说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六年期间，对于劳工运动受挫于法西斯的问题已经有一些十分重要的看法。

霍：可能我们这里谈到的不单是被法西斯挫败的问题，而且是双重挫折的问题。早些时候，在占领工厂时期，革命前景就已消失。战后时期，意大利的政局在西欧是最富有戏剧性之一，意大利劳工运动则是这一政局的不幸后果的具体受害者。

那：事实表明，葛兰西一九二〇年的预言是正确的。他认为要么是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找到一条出路，要么是有产阶级的“强烈反应”。革命运动的低潮和被法西斯挫败这两件事情是密切相关的。葛兰西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六年期间回顾了前些年经验，他一方面探索革命运动低落（令人痛心而又倒退到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的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探索法西斯得胜的原因。他在那些年里已经开始找出一条克服宗派主义和公式化错误的路线，宗派主义和公式化的错误有助于法西斯的胜利。他就这些主题进行的思考和探索持续了许多年。不论是葛兰西在狱中的著作还是党在意大利国内外进行的工作，都在这些方面有所发展，逐渐制订出今后可以避免新的挫折、首先是建立最广泛的反法西斯战线去击败法西斯的道路。

霍：你们是怎样找到这条道路的呢？

那：经过共产国际内部极其对立和激烈的讨论之后，第七次代表大会选择了实现反法西斯力量的最广泛团结的路线。这

次会上，劳工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明确表示了全力支持保卫一切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必要性。最后，以西班牙共和国的经验为依据，共产党人（特别是陶里亚蒂）提出了一个“新型民主制度”的前景。

发展这样一个前景何以如此重要呢？这是因为它为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这个问题是：反法西斯斗争的目标究竟是象社会民主主义力量所希望的那样恢复资产阶级民主（这是各国共产党对社会民主主义力量的指责），还是象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政治上最拘谨的时期所主张的那样，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人造的难题曾经使争取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特别是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团结起来所作的努力化为泡影。新前景的提出使意大利共产党和陶里亚蒂得以解决这个人造的难题。这个新前景就是：反法西斯斗争的目标既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单纯恢复资产阶级民主。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新型的民主政权，克服法西斯统治前的那种民主制度的局限性和根本缺陷，并且为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和深刻改革开辟可能性。

**霍：**现在你接触到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你所提到的新型民主制度的理论，并不仅仅限于意大利的前景。英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七大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当然意大利人的经验（他们对法西斯制度的分析，他们对葛兰西称之为阵地战而非运动战问题的发挥），这一切都使意大利共产党的思想和斗争对于发展这一前景所作出的贡献比其它国家的贡献更为突出。

我不知道意大利的客观形势中是否还有什么其它东西有助于使意大利共产党起那么重要的作用。总之，意大利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中居于独一无二的地位。是否可以这样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期，意大利既不属于第三世界，也不属于

第一世界。

那：我想意大利作为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具有的历史条件，当然会有助于推动意大利共产党强调有关民主革命的问题。我们只要回顾一下早在党被宣布非法以前，在有关南方问题和农民问题等基本方面所作的工作就够了。不管怎样，我们确实是不断地、有意识地从我国很大一部分地区仍然顽固地存在着前资本主义残余的历史事实出发，努力开辟这样的前景，把争取民主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甚至在五十年代初（由于开展了使南方获得新生的统一人民运动），我们有一些党员还认为意大利南方斗争的目标只不过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已。这种观点受到了那些主要在南方从事党的工作和为争取改革南方而斗争的同志的质问，我认为质问得对。另一方面，在抵抗运动结束后，甚至就在抵抗运动高潮时期，我们当中有些人曾经强调，意大利正在进行民主革命，应当鼓励这种革命，而不应当把它限止在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框框里。当时主客观条件都已经具备，这种民主性质的变革和革新很可能在一个新的基础上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霍：不过当时在有关民主问题上作了明确的区分的。当时的思想肯定是恢复民主和发扬民主，而不是倒退到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主义的进化论上去。

那：不止是这样一个问题。我愿意再提一下意共经验中另一个具有特点的东西，这将有助于说明意共为开辟全欧共产主义运动新前景所作的特别突出的贡献。我特别是指它在分析法西斯制度及其阶级性质和基本特点方面的发展。从这些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看法，即：必须铲除法西斯主义的根基，特别是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根基。这一看法在推动民主辩论方面变得很重要，我们所讲的一个新型的民主制度，不只是恢复法西

斯统治以前的那种民主制度，不只是指法西斯统治以前的民主制度所具有的那种通过议会逐步演变的弊病，而且是指需要赋予民主制度先进的经济和社会内容。首先，我们想要通过结构改革、经济和社会结构上的广泛改革，建立起铲除法西斯主义根基的经济制度，从而避免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同法西斯统治以前的民主制度作比较，这是我们希望建立的新型民主制度的主要的、突出的特点。

霍：这就把我们引到有关战后共产党的战略问题。你讲到必须通过结构改革铲除和摧毁法西斯制度的基础以避免退回到旧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导致法西斯的产生。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那：意共从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起，新制订了一系列的改革计划。第一项就是土地改革，打击的是大土地所有者的财产，特别是侨居外地的大庄园主。另外一个方案就是当时所谓的“工业改革”，设想以加强民主国家在经济计划方面的作用来限制大垄断资本集团的权力。那时，我们也努力发展新的群众参与形式并且促成一种使劳动人民和广大人民群众更加团结、活动更加多样化的民主组织。我们的主要考虑是既要防止再次出现使反动势力得以重新组织起来和取得主动的政治和社会风气，也要破坏旧统治阶级的权势，防止它们重建足以发动法西斯反动攻势的基础。

霍：你们是如何解决群众的民主组织问题的？

那：首先是同法西斯遗留下的东西决裂，并且将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引向自由和真正参与(管理)的原则。最近，党的档案部门公布了一九四四年头几个月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天主教人士为建立统一的工会联合会在罗马(当时仍在纳粹占领下)进行谈判的文件。朱塞佩·迪·维多里奥代表我们党进行谈

判，他遭到社会党人的反对，也遭到天主教人士的反对，后者主张在新的民主制度下保持由法西斯合法建立的单一的强制性工会。他们所关心的是通过强迫参加工会和自动缴纳会费来增加会员人数和工会权力。今天任何人读一读这些文件，都会对迪·维多里奥抨击上述主张的权威性（虽然还不能说是激烈的）发言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赞扬和强调工人经过二十年的可憎限制之后“需要自由”，他认为合法的强制性工会将会是一个官僚主义机构，“拥有大量金钱，设立许多办事机构并雇佣大量人员”，却“为工人阶级所厌恶”。他提出需要建立一个完全民主的工会，“把主要倡议权和权力交给群众”。他的这条路线由一九四四年六月罗马公约予以确认并成为在自由意大利建立统一的工会联合会的基础。

当然，不言而喻，贯彻这条路线是有巨大困难的。许多年来，自由地建立和巩固群众性工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尤其在南方某些地区。但是根据群众的民主倡议权建立组织的思想，曾经是，现在仍是，防止法西斯卷土重来和建立一个新型民主制度的关键之一。如果我们还想使用三十年前的一个词，那就是进步的民主制度，即：超出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范围的民主制度。当然，它还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因为国家和社会的基础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性质的变革。

霍：那么，当时你们是在力图为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建立基础。不过你们是怎样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呢？你们是否把这种过渡看成是个长期的过程？

那：毫无疑问它是个长期的过程。迅速向社会主义过渡完全不是我们所设想的前景。即使我们当中那些正当北方在进行激烈的解放战争时入党的人，对这一点也是清楚的。

霍：这就提出了两个问题。当时有一种批评意见，是根据

有可能用更快的速度走向社会主义这样的论点提出的。换句话说，为什么共产党在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不去夺取政权？

那：在抵抗运动期间和抵抗运动刚结束的时候，在进行过抵抗运动并且为劳工运动取得重大成果的那些地区，甚至在我们自己的队伍内部也出现过这类讨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即使在那些地区，陶里亚蒂和党的领导集团所确定的政治路线也是占上风的。我指的是他提出的团结起来重建国家，进行结构改革和建立一个新型民主国家的路线。

确实，近年来对意大利刚解放时的形势所提供的可能性也进行过讨论。有一种政治批评是“来自左的方面”的，就是硬说我们没有利用解放战争及其胜利结果所造成的“历史时机”和革命条件。在我们看来，这种看法得不到多少支持，也说服不了人。

即便在编史方面，占上风的也是比较公正的看法。这种看法符合从那段时期生活过来的人的切身经历，特别是那些在南方而不是在北方生活的人。这些人看到了存在着两个意大利的具体现实，以及整个国家存在着极端矛盾的现实。他们当时意识到国家有分裂的危险，出现南北历史性分裂的危险。他们所依据的是对于当时意大利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对比的一种现实主义的考虑。何况也还要考虑国际局势，考虑到意大利当时还处在盟军占领下的特定条件。意大利当时已经毫不含糊地被划在某种政治军事区域之内。

霍：我确信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意大利局势不允许采取革命的解决办法，尽管许多人想这样做。另一方面，对这个问题也可能提出第二种批评意见，也许这种批评有更为现实的根据。你说当时必须摧毁法西斯制度的基础。然而我怀疑当时这种基础是否确实摧毁了。是否真正防止了旧式的资产阶级

民主制度东山再起？

那：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七年期间，曾经开始革新的进程，其目的在于摧毁法西斯制度的根基，和建立一种新型民主制度，这个革新的进程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这个被我们称为民主的革命或反法西斯的革命，却由于国际上出现的冷战和国内反法西斯力量之间团结的破裂而突然中断。一九四七年春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被排斥出政府。此后，意大利的政局彻底倒退，使我们无法取得更有实质性的结果。虽然我们的目标不是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也不是迅速向社会主义过渡，但还是需要进行深刻的变革。

尽管如此，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七年的一些成果确实在下一阶段起了作用。这些成果成为抵抗反民主和反共攻势的强有力的依据，并且也成为保持重新展开反法西斯革命可能性的强有力的依据。

霍：解放战争期间，劳工运动和反法西斯运动无疑掌握了广泛的领导权。不过人们怀疑在战争结束时，由于对这种领导权的过度信任而忽视了有效地摧毁法西斯的社会和结构基础。天主教民主党同基本上未加改变的官僚机器的结合是否会使“资本主义复辟”？

那：我不愿人们误解我的意见。我刚才说的并不是指我们在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七年期间没有犯过什么错误。最近十几年当中，我们自己曾经几次努力指出在刚解放初期所犯的一些错误，如：在争取改革和建立新的政治经济的行动方面所犯的的错误；在革新国家而采取的行动方面所犯的的错误或存在的缺点。你曾经特别谈到后一个问题。毫无疑问，我们不但在机构方面没有能够实行具体的变动，而且我们也许还低估了这种变动的必要性。因此，在许多方面，我们确实仍能看到法西斯时



期和法西斯统治以前的国家结构同法西斯时期以后的国家结构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天主教民主党的保守政府（以及因而建立起来的天主教民主党的权力体系）也带有这种继承性。

我确信我们需要就这个问题进行更仔细的思考和自我批判性的研究。我们尤其需要就今后如何对待国家的改革和革新问题有更为清晰的观点和更为具体的设想。这些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霍：**你认为抵抗时期和解放初期为意大利、为劳工运动和共产党留下了哪些积极的、带永久性的东西？

**那：**首先，这段时期留下了一个共同的政治结构，一种鼓舞力量和团结力量。当然这在反法西斯阵线内各种力量发生正面冲突时期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到了六十年代，它重新起作用了。反法西斯团结的遗产始终是个能够重新起作用的政治事实，并且能得年轻一代的新的、决定性的支持。其次，现在还有着当初那种全力以赴地建立一个有组织的民主运动的力量。在那些年月，意大利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使历史上一一直被排斥在外的群众，特别是南方的农民群众和下层阶级，得以参加政治和社会生活。

**霍：**南方的觉醒……

**那：**是的，在那些年月，南方已经开始觉醒。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以后，在那里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起点和最早的事件（如占领未耕地的运动）是刚解放时在南方发生的。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他们既从上面也从下面采取行动促进这种觉醒。我要再说一遍，也从上面采取行动，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共产党人的农业部长福斯拉·古洛在政府里采取的政治行动。他颁布了法令，把未耕地或耕种不善的土地让给农民。

与此同时，在北方（南方如那不勒斯这样的大工业城市也

是如此)，工人阶级在重建国家和发展生产方面起了领导作用。这方面的成就成为意大利局势的经常性的特点。

最后，我们有宪法。立宪议会的工作是在共产党人被排挤出政府之后才结束的，但是立宪任务还是顺利地完成了。宪法规定出一个参照的范围；它为劳工运动和民主运动提供了支持，宪法的巨大价值只是在此后才显露出来。今天，宪法还是进一步发展革新社会斗争的一个重要基础。这部宪章提出了极其先进的民主原则，甚至还提到有关民主地组织国家的原则（我们在争取尚待实现的改革的斗争中可以有效地以这些原则为依据）。

霍：我们也许还可以再加上两、三点看法。一点看法就是共产党在历史上始终是个群众性运动，它是国家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不容忽视的因素。第二点看法是，在国外，人们对于意大利国家生活中出现反法西斯、民主和进步因素在文化方面占据领导地位这样引人注目的情况，以及这种情况继续保持下来，有着深刻的印象（这同西德情况截然不同，那里破除旧的保守传统用去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在意大利，战争一结束，右派知识分子就几乎没有了）。

第三点看法，我们外国人对意大利人民以某些方式通过群众性反法西斯斗争清除法西斯流毒一事印象深刻。大多数人并不因为曾经是法西斯主义者而背上沉重的包袱。这一切形成了一种永久性的基础，至少可以使意大利今后的发展排除某些消极的政治可能性。

那：你所讲的那些成就和成果，有些是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七年间取得的；有些主要是以后几年落实和巩固的，那几年有可能出现大的倒退。但由于我们在冷战时期所采取的政治行动，才没有发生大的倒退，即使在一九四八年意共被挫败之后，意

共在每次选举中的影响仍继续增长。这段时期，我们甚至还能在知识分子中间巩固反法西斯斗争和劳工运动的领导权。

我认为冷战年代的经验，其重要性不亚于解放初期的经验，也许不亚于抵抗运动时期的经验。这个经验就其重要性来说毫不逊色。

霍：那么就让我们接下去谈谈一九四七年以后那段冷战时期吧。

那：我将联系共产党继续发展的方法来谈谈这段时期的情况。只有当我们看到了党在政治上的一贯性，以及不断改进它的一些有特点的基本选择，才能解释你刚才强调的那种共产党在政治选举中力量不断增长的情况。在这些有特点的基本选择中，首先就是党在保卫和发展民主方面承担的义务。甚至在今天，就是在意大利国外，人们在评论共产党关于保卫民主或在民主范围内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观点时，不管他们赞成与否，他们都把这些提法说成似乎是一种简单的有关信仰的声明。

然而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的观点是大不相同的。这些观点是经验的总结，是经过长期的、艰辛的过程才得出的看法。它们是党几十年来工作的实质性内容。在冷战年代，在天主教民主党在议会中掌握绝对多数并且实际上垄断了政治的年代，我们仍然发挥民主抉择的含义。我们支持一系列有关自由的准则，从而成为自由的战士。我们不得不保卫自由的准则，反对那种严重限制民主权利并且公然违犯共和国宪法所认可的种种民主原则的政治势力。

我们共产党人当时在意大利广大公民群众的眼里成为自由的最坚定的捍卫者（我们同社会党人一起，共同分担反对派的责任），首先是捍卫工人阶级的自由（工人阶级进行组织和斗争的自由），捍卫工会权利，同时在更普遍的范围内捍卫政治

自由(政治自由受到强大的愚民政策攻势的袭击)、文化自由和议会特权。我们不仅捍卫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权利，而且也捍卫每个人的权利和民主政权本身，我们通过这些斗争来回击旨在置我们党于死地的进攻。在那个年代，有人甚至玩弄使共产党非法的花招，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自己的行动局限于仅仅保卫我们党。这是一个基本点。

霍：你认为那段时期还有什么其它具有特殊重要性的活动？

那：具有特殊重要性的是，我们所持的反对态度既不完全是消极的，也不是宣传性的。我们经历了真正发生正面冲突的年代。当时的统治力量和天主教民主党领导的各届政府，妄图用各式各样的恫吓和歧视来摧毁人民运动。我们党和左翼阵线坚持反对立场来作出回答。但是与此同时，我们总是努力指出解决我国问题的可行办法，就是说，我们在同政府对峙时不仅局限于进行谴责、批评和斗争，同时还为我国的经济、社会、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制订出一个替代性的、不同的和可行的政治纲领。这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在那些年月，我们并未失去作为执政党、作为一支潜在的统治力量的特点。我们并没有模糊工人阶级所要求的统治作用，在解放初期，在某种程度上是起到了这种作用的。

我想回顾一下意大利总工会于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提出的“劳工计划”的经验和例子。这是劳工运动在它处于守势和相当困难的时期表现出巨大主动性的一个例子。我之重新提起意大利总工会的“劳工计划”这个例子是因为，假如我们不仅关心共产党的发展而且也关心整个意大利劳工运动的发展，我们就必须重视我国工会运动的这种独一无二的特点：它并没有使自己局限于单纯保卫眼前利益，单纯要求改善在业工人的

经济条件。相反地，它还通过在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经济问题上的表态，提出维护人民群众和整个国家普遍利益的问题。

霍：确实，我认为这点十分重要，共产党从来不让它的敌人把自己孤立起来，而是通过参与国家政治来不断地发挥政治作用。另一方面，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四年是自卫性斗争的年代，那几年，共产党确实丧失过一些阵地和条件。你是否认为这是由于冷战的气候造成的？

那：那几年的气候确实非常严酷。我记得很清楚，在美国垄断原子弹和朝鲜战争时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即使不是实际上不可避免的，也似乎是现实的，并且迫在眉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同一时期建立，意大利参加在内。这也加重了我们的担心，我们明确而彻底地持反对态度。对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和劳工运动来说，那些年是一场生死搏斗眼看就要到来的年头。当时的政策显然是要把社会主义世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定的疆界线往后推移。这种气氛使得我们党同社会主义世界团结起来并采取完全一致的立场。

然而，今天我们应当说，这种作法驱使我们采取了一些在今天看来是难以接受的错误态度。由于上述原因，我们终于为苏联共产党和其它执政的共产党干涉文化和艺术生活进行辩护。这种干涉最后变成对于某些倾向的激烈谴责，从而在有关文学、艺术、文化甚至科学研究等方面赋予党以一种极端的决定权。事实上，我们当时为这种干涉辩护的态度，反映出我们自己也还没有能够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当时我们还没有对政治同文化的关系、工人阶级政党同文化的关系等问题确立我们自己的看法。

推而广之，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同社会主义世界完全站在一起的作法，使我们在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

影。人们因此产生了怀疑，认为我们提出的前景在本质上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和政权机构是一个类型的。长期以来，这种怀疑使我们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它减缓并限制了我们的影响的扩大和我们的联盟政策的发展。

霍：我对于意共和劳工运动在五十年代所遇到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也很感兴趣。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〇年的几次大规模斗争之后，工人阶级在北方失利，农民运动在南方也受到削弱。你如何解释这些事实呢？

那：有各种各样因素可以作出解释，但我在这里只想提一点，即：某些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意大利社会的新的发展过程的逐渐成熟），以及我们没有及时注意到这些变化和恰当地改变我们的政治行动。这就使我们在大工厂中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多，也使我们在南方斗争中遭到意外的挫折。在这方面，情况很特殊，我们对造成南方农村的“新”形势作出很大的贡献，而我们当时却迟迟未能明白过来。客观上，夺取未耕地的斗争进展到某个阶段就结束了，随着各届中央政府开始颁布的各种改革而出现了新的问题。这就为农民群众的斗争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当时农民群众的成分和社会地位正在起变化。我们未能适应这方面的问题。此后几年，我们遇到的已是农业生产的方向问题，市场问题，同个体企业的关系问题，以及同大型的垄断资本工业的关系问题。总的来说，我们迟迟没有认识到意大利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伟大阶段已经开始。

霍：世界经济在五十年代开始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发展，事实上，意大利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为什么你认为意共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历史上的这个转折点（尽管意共在这方面不是独此一家）？无论如何，这次大发展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不仅仅是一次资本主义的稳定化，不是吗？

那：当时的政治形势促使我们共产党人去指责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保守和倒退现象，以及经济和社会局势中的种种消极现象。我认为正是这种情况使我们未能较快地看出正在臻于成熟的种种新发展。

问题是复杂的，并且同公式化的立场有关。在我们队伍里，对资本主义及其在垄断阶段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仍持有公式化的立场。那种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发展的停滞是资本主义在当前历史阶段的主要特征的看法，曾经在党内流行，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尤其是我们低估了意大利资本主义可以自由动用的储备力量，以及可以在一段时期内在意大利形成急剧的、五花八门的经济发展的那些国际国内条件。因此，我们在五十年代头五年忽略了“经济奇迹”的酝酿阶段。

霍：如今，“大繁荣时期”已经成为过去。不过，回过头来看看，你认为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那：我们曾经多次讨论意大利经济大发展的意义，你是知道的，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三年间意大利的经济发展是异常急剧的。实际上，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经济发展还没有显示出衰竭的迹象，当时看来肯定会把诸如南方问题等历史性问题全部解决掉，不少人曾经有过这种想法。

一九六二年，我们在葛兰西学院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了意大利资本主义的趋势。后来和最近的发展充分证实了我们当时在会上所作的推测，一些最严肃的学者的工作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当时说，眼前的发展无疑地将导致我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但是这种发展同时又是以矛盾重重和严重的不平衡为其特点，其结果必将使这种发展产生危机。于是，资本主义依靠农村和南方提供大批劳动力，其部分动机是要破

坏劳动市场和压低工资，但是事实证明这个算盘打错了。随之而来的是忽视农业和南方，结果将使农业和南方越来越成为意大利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矛盾和致命负担。更何况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大发展（别忘了从一九六四年起开始了一个很不稳定的十年，其特点是时而衰退时而前进）是国外的需求和出口起了作用，因为，意大利在国际分工的范畴中显然处于从属地位。意大利确实参加了你所讲的那次资本主义神话般的世界性大发展，但是由于它所处的地位，后来它比其它任何国家都更容易受到资本主义衰退和危机的影响。

霍：这么说，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就有可能看出意大利大发展的特殊和具体的弱点了？

那：我是这样看的。

霍：资本主义的大繁荣，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使工人阶级运动前景十分捉摸不定的一个时期；然而事实上党的战略纲领，无论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方面，都恰恰是那些年制订和发展的。这个纲领也就是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纲领。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应当说，在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一方面，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确实一度造成不稳定和困难，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政策有了新的、极为重要的发展。一九五六年的转折点具有决定性意义。在那关键性的一年里，我们作了巨大努力以便就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得出一个清楚的看法。实质上我们的努力，是就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及后来匈牙利的悲惨事件）所提出的严重问题作出回答。这意味着接受和发展从二十大产生的一切积极的促进因素，一切新的理论和政治方针。于是我们力求解决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在冷战时期，在苏共二十大以前，特别是一九五三年和



一九五四年以前，甚至都是不肯承认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专门对我们前几年的政治立场进行了批判性的估价。我们努力使自己摆脱那些妨碍我们充分理解意大利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中出现的新因素的公式化概念。与此同时，我们拒绝对这些新因素作机会主义的解释，拒绝那种过高估计“新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作出让步的倾向；我们提出了更加符合意大利现实、更有说服力的社会主义前景。自然，这样讲并不是否认此后几年（特别是六十年代）还有其它重要原因使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与此相关的是意大利工人运动内部出现一些不稳定和混乱的时期。

霍：让我们现在谈谈一九五六年吧。各国共产党对待二十大的态度是不相同的。意共比别的党从中得出了更深远得多的结论和看法。能不能这样说，意共由于摆脱了斯大林主义的束缚，借二十大的机会来发展自己的路线呢？

那：一九四七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突然制止对于走向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探索，从而使意共受到很大损失。尽管这种探索从二次大战一结束就已经开始，而且不只是在意大利进行。意大利党受到的损失特别大，因为它在规划出一条独特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方面已经取得相当大的进展，并且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在共产国际七大以后，它就开始这样做了。你还记得吧，我们以前曾经谈到制订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也即进步的民主制度的前景。就这方面来说，葛兰西在狱中围绕探索一条不同于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做了很有启发性的工作；他的《狱中札记》从五十年代开始就成为党的干部所要继承的遗产的一部分。当然，当时对他的思想和政治经验的许多方面都还没有进行公开的探讨，也没有对照他的思想同

党的思想的不同之处。后来苏共二十大为我们提供了大力恢复一度中断的探索的机会，使我们的一系列观点（包括理论观点）得以连贯起来。意大利党的领导毫不迟疑地抓住了这个时机。我们研讨了许多相当根本性的问题，如：将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在多党制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承认市民社会各种力量独立自主的基础之上的问题；党同工会、群众组织建立新关系的问题，以及即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也需要承认这些组织的独立自主权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澄清了我们同民主制度和自由的关系。我们提到把一些自由称之为资产阶级的自由是不正确的，因为象意大利这样的问题，工人阶级在争取和巩固自由方面是起了作用的。我们提到有可能部分地（在现阶段是大部分地）消除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欺骗性。我们提到需要“纠正”列宁在提出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问题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方面的某些做法。

霍：你们是什么时候讨论的？

那：一九五六年，在准备意共八大时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在那次代表大会上，我们阐明了我们的全部立场，以免在我们发展民主的斗争同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的关系上留有什么含混不清之处。我们想消除这样一种看法：认为我们党只是在还不需要向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跃进”的时候，才愿意推进同其它政治力量合作的路线，并且只遵守民主竞赛的规则。相反地，此后历史进程的发展和我们的政策的发展将越来越相似。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就是如此。我们是否这样认为呢？我们坦率地面对了这个问题，并且消除了任何含混不清之处。我们不仅阐明了我们对于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看法，而且也阐明了我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看法，以及我们关于民主和社会主义关系的看法，民主同社会主

义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

霍：但是这样做，你们是否会冒造成别的误解的风险呢？就是说，如果人们预见到，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通过无数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来实现，那么如何能避免不陷入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呢？总之，存在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意共是否开始变成又一个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党，变成一种新型的费边主义呢？

那：从一九五六年起到现在，我们就在研究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不断地澄清我们的立场并且消除一切新旧误解。

陶里亚蒂在一九六三年初的十大报告中，坦率地谈到我们关于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见解，包括逐渐发展的观点。我认为我们的观点与那些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学说和作法不同之处，实际上并不在于我们是否接受渐进主义观点。我深信我们之间的基本区别是在其它方面，如：是否真正具有走向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远见，是否具备理论工作、思想斗争和严格地评价世界各地社会主义建设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所需要的一切，是否具备在国际上选择站在哪一边的必要条件。我并不是说站在哪个军事政治集团一边，而是指在反帝斗争、在同人民解放运动发展国际联系，以及同世界上广大地区人民争取真正经济和政治独立的斗争发展国际联系方面，采取公正的态度。我深信，关于应当采取什么步骤，实行什么改革，如何发展民主，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因为这些也可以成为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路线的一部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将力求使民主具有越来越新越丰富的内容——促进群众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管理方面真正的参与，变革经济和社会结构，在阶级力量对比方面实现根本性的变化。

霍：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以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有许多

多起伏、妥协等等。但是正统学派（如果可以使用这个词的话）总是把权力的改变和转移，看成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虽然这种改变和转移并不一定按十月革命的方式实现）。

那：我讲到了我们观点的一个特点恰恰就是改变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这就是看看这种变化能否逐渐自动发生。根据我们的经验，我深信这是可能的。毫无疑问，近五、六年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政治影响有了增长，工人阶级干预我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能力，甚至对我国发展总方向有着极大影响的那些决定进行干预的能力，都有所增长。今天，更换统治阶级的问题已经提上日程。至少也是最重要的，是承认工人阶级、劳动群众应当在政府中占有适当的地位。因此，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比较长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内，那些最广泛地代表工人阶级的力量和那些代表其它阶级的力量，将会在我国政府中共处。我们可以假设工人阶级（劳动阶级）在政府一级对社会和政治生活日益增长的影响会有具体表现，同时，对抗的社会力量争夺领导权的辩证关系和斗争还会继续发展。当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工人阶级及其盟友的全面领导，这仍然是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想要实现的目标。

你知道，从一九五六年起（我总离不开这个转折点）我们日益明确地提出这样一种观点，把革命看成是一个进程，看成是工人阶级通过在各条战线上同其它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而逐渐确立统治阶级地位的进程。老实说，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同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和作法没有多少关系。我认为我们的看法确实是一种独特的看法（你也可以称之为探索），这种看法符合我们作为共产党和工人运动在意大利国内外积累起来的全部经验。这就是我们从一九五六年开始至今还在进行的讨论。

霍：陶里亚蒂去世后，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事件的讨论是如何开展的？

那：早在陶里亚蒂逝世以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就已经开展了辩论。雅尔塔备忘录<sup>①</sup>清楚地证明了意大利共产党对各次分裂（中苏之间发生的分裂是其中最严重、最深刻的一次），以及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问题，都竭力采取独立自主的立场。后来又出现了其它一些事件（首先是捷克事件），强烈地迫使意共领导不得不进一步加深和发展自己对于社会主义、对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对于社会主义世界的问题以及对于全世界革命和工人运动的看法。

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严重的时刻。我们不应忘记，在苏联和其它华沙条约国对捷克进行军事干涉之后，我们不得不立即作出的决定是何等重要，对我们来说，公开发表文件，表示完全不同意这种干涉的做法是多么重要。因此我们党中央委员会以隆哥的报告的形式，就我们的不同意见，准备了详尽的说明。随后几个月，对捷克的军事干涉所引起的问题，同进一步自主地发展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路线的那些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这就是我们党十二大（一九六九年初在波伦亚召开）的意义，和随后提出的我们党对待世界各国共产党会议以及在这次会议上应遵循的路线的意义。至于有关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我们坚决贯彻在差异中求团结的方针。

霍：我是否可以把手题转到另一个问题，即党的干部问

---

<sup>①</sup>雅尔塔备忘录即指意共已故总书记陶里亚蒂在逝世前，于1964年八月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留下的遗嘱。它系统地、全面地阐述了意共对国际共运重大问题的立场和主张。陶里亚蒂逝世后，由当时继任总书记的隆哥决定予以公开发表。——译者

题？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发生了重大变化。抵抗运动的一代（也就是你们这一代）从何时开始成为全国的领导？在陶里亚蒂逝世以前吗？

那：是的，在陶里亚蒂逝世以前，从八大（一九五六年）开始。我们这一代的许多党的积极分子在八大时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在以后的几次代表大会上，他们逐渐使人们感觉到他们在党的领导机构中的作用。这实质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你也可以称它为生物学的）新陈代谢的过程，而是一九五六年以前就已开始的一场更新党的斗争的结果。在许多省组织和党委会中，这场斗争是在准备召开八大时结束的。直至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可以把这场斗争看成是把党真正争取到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这个重大战略抉择一边的决定性因素，从而消除了党的方针和作风上被称为“表里不一”的东西。这场斗争向所有的人保证我们党是言行一致的。实际上，领导集团仅仅是制订和阐明路线是不够的。党是一个活的肌体，假使它不是根本上深信路线正确（通过民主讨论，必要时通过深刻的政治斗争），假使它的领导力量不能适时地按照过去通过和一贯坚持的路线加以更新，那么迟早会发生矛盾，使党为之付出代价。

霍：在我看来，领导集团内部对陶里亚蒂从二十大到雅尔塔备忘录这段时期发展的国际路线，似乎不存在什么重大分歧。我没有看错吧？

那：是的，你没有看错。当时只是在党的中层干部中有人持保留意见。

霍：然而，在陶里亚蒂逝世之后，党内（甚至在领导集团内部）在国内政策上确实发生了意见分歧，虽然后来解决了。你能否讲讲这次争论的情况？

那：这次争论情况很复杂。今天看来也许难于理解（我是

指一九六六年初意共十一大上爆发的那次争论)，但这次争论很能说明我们党和意大利工人运动在那些年头遇到的困难。此外，由于我们许多人在陶里亚蒂去世以后感到担心，认为需要巩固而不是损害党的团结，因此使这场争论更加激烈。

你前面讲到在资本主义、特别是欧洲资本主义繁荣的那段漫长时期，使工人运动（不只是在意大利）困惑的种种疑问。甚至可以说，当时看不到前景或者是前景暗淡。大约在五十年代末，欧洲左派就新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展开了一场有代表性的辩论，看来这场辩论批驳了马克思的预言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甚至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还有过一次生动的、激烈的辩论，争论的内容是关于工人阶级同资本主义制度“融合成一体”的危险性，关于工人阶级顺从地适应资本主义的“规章制度”和统治阶级提出的行为规范的危险性。此外，在政治上，确实存在这样的阴谋，企图用一种从属性的、受约束的政府合作来捆住社会党所代表的工人运动的手脚。其目的在于从地方行政到工会组织分裂工人运动整体的团结。一九六二年开始执行的那种野心勃勃并且有不小可能性的中左联合政策，很快就成了这个阴谋的工具。

这种作法是严重的、卑鄙的，在我们党内引起了惊恐和紧张。当十一大召开时，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关系已经严重恶化，在筹划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合并问题上，共社两党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资本主义繁荣和意大利社会党同共产党联盟的结束以及中左阵线的形成等复杂情况，直到一九六八年对我们始终是一个沉重的压力，使我们感到前途茫茫和忧心忡忡。于是一九六八年到来了。

霍：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所有这些疑虑和讨论都由历史本身

解决了，即：当人民群众的斗争重新炽热起来并且变得更为激进，以及当一次资本主义危机的轮廓已经显示出来的时候，问题就解决了？

那：一点不错。一九六八年是个突破。不过意大利，一九六八年不单是学生造反、青年抗议的年头，而且也是明显向左转、意共在大选中取得牢靠的胜利的年头。这是在中左联合和社会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开始发生危机的时候。当时来自工人阶级的、富有战斗性的新冲击把工人运动的团结和改变社会关系的问题有力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一九六九年社会党恢复独立自主并且开始检查它的政治路线。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逐渐和解开始了。

霍：但是与此同时，在共产党之外形成了一个左翼。这是件新鲜事情。在我看来，这似乎体现了对工人阶级历史性组织活动的批评。你是否认为这种批判完全没有道理？

那：所谓议会外的左翼并不是在批评中产生的。而是产生于根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和其它“传统”组织的领导能力。当然，即使对我们这样一直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党也有理由进行批评。我们对学生人数大幅度增长的涵义和带来的问题，这种增长所带来的矛盾，以及在学生群众中间酝酿着的不满和反抗情绪，领会得太慢了，这是明显的事实。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它为攻击工人阶级的传统组织提供了某种群众基础。为了说明这种抗议性运动产生的原因，除了这一社会事实外，我们不应忘记当时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中的思想危机和政治危机：中苏分裂，中国对象我们这样一些党的批判所造成的影响，“第三世界”的革命经验和理论的影响。

霍：党如何对待学生的造反和“来自左的”冲击？

那：这个问题很重要，也有许多事情可谈。从一九六七年



底到一九六八年初，我们经历了一个关键时期：我们深深感到同新生力量（尤其是学生，但不只是学生）决裂的危险。这支新生力量在朝着革命方向推进，尽管他们所采取的形式是混乱的并且常常是难以接受的，而且同我们党、同我们党的政治思想传统不一致。相反地，他们都向党进行挑战；看来似乎是无法接近的。我们党内也有各式各样的反应，当然不是所有的反应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倾向于全盘否定，有些人倾向于过分迁就。总而言之，一条自我批评的调查路线占了上风。我们努力分析学生抗议的种种根由和社会、思想、政治或文化的因素，既不“出卖”我们的传统，也不蛊惑人心地跟着那些反对我们的主张走，或者把这些主张接过来变成我们自己的主张。我们尽量了解我们在各方面的不足之处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并且从中得出结论，直到纠正我们的某些态度，克服我们的某些惰性。一九七一年，我们组织了一次会议，讨论“六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和青年一代的思想和政治修养。对于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爆发的运动的性质和具体情况，我们努力结合坦率的自我批评，尽量加以理解并进行严厉的批评。一九六八年的选举结果表明，我们成功地克服了这个最危急的阶段，并成功地同在抗议运动中涌现的一些杰出的年轻人建立了关系。

霍：学生的骚动更多的是抗议运动，不是吗？一九六九年秋在意大利（如同一九六八年五月在法国一样），曾经有过异乎寻常的、多半是自发的罢工运动。

那：一九六九年意大利的大罢工运动无论如何不能说是自发的。工会在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遭到严重困难，并且不得不作出巨大努力进行革新。不过他们在推动一九六九年的斗争中完全确立了他们的领导地位，这正是因为他们懂得青年人的抗议运动带来的教训和冲击——首先是推动组织和群众之间

建立起新的民主关系，推动工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工人）更积极地、直接参加领导斗争。因此上述抗议运动仅仅触及工人阶级的外缘，而未深入地渗透到工人阶级内部。

那段时期，对运动自发性的颂扬和完全否定工人阶级“传统”组织的战略和作用（极端主义者认为是不可救药地过时了），导致“宣言派”同我们党的决裂。然而事实说明，他们的主张是前后不一贯的：“宣言派”以及其它议会外左派团体的许多模糊的要求或期望都落空了，并且转而采取了大相径庭的作法，终于不得不放弃那条建立新的政治和工会工具以取代工人运动“传统”组织的路线。

霍：我们可不可以肯定地说，党成功地革新了同一九六八年的青年人的联系，党内涌现了一代新人呢？

那：是的，从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年开始，抗议运动的活跃分子中，有很大一部分青年人，在经过同我们党进行激烈论战的阶段之后，加入了青年团和共产党。这一趋势继续了几年。从这些青年人当中，我们很快地挑选和提拔了新的领导干部。一九七〇年以后，党经历了一个紧张的和普遍干部青年化的过程，二、三十岁的干部在支部和党委会中担负起重要的职责。

## 二

霍：六十年代的结束标志着历史的转折点，使我们进入新资本主义发生危机的现阶段，在五十和六十年代新资本主义看起来如此繁荣和稳定。我们两人都认为危机的初步征兆是社会的紧张气氛。

那：是的，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各种运动异常广泛和富有战斗性，这种情况可以解释为危机前经济发展进程内部社

会矛盾的爆发，危机就产生于这种经济发展本身。

霍：我想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转入对时局的讨论，目前的形势是资本主义再度遭到危机。首先，你是否也认为目前危机虽然同三十年代危机有相似之处，却并不完全一样？

那：我想谁也不会否认资本主义世界当前危机是异常深刻和复杂的。但是我也不想只从本国，只从意大利工人运动的观点出发，对危机作片面的分析。也许可以让我反问你这个问题，因为你可以不从意大利的狭窄角度出发来回答。从站得高一点、广泛一点的角度来看，你认为目前危机应如何解释？你同意我们暂时互换位置谈谈吗？

霍：可以，但是你很清楚，要解释当前危机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据我看，我们肯定已经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历史时期的末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不再可能复苏。也许可以把这次危机同十九世纪末的所谓大萧条时期相比。你不要忘记，当时虽然生产指数一直上升，但资本主义经济几十年来一直存在某些困难，在这期间，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有了发展。今天我们还不一定进入象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那样灾难性的危机。要说得比这严重也许还为时过早，但如果我们两人都认为现在已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历史时期的末尾，那么我们就可以来讨论一下这种情况可能产生的一些积极和消极后果。你看怎样？

那：我想我们对这个问题要注意，既不能认为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很可能发展成为灾难性的，同时又不能低估它的空前严重的特点。有人将这次危机比作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的危机，但是从许多方面看，这种说法没有说服力。同时，事实又说明我们所面临的不只是传统性质的周期性起伏。只要看一看目前危机的某些表现和含义的严重性，就可见一斑；现在

有货币危机，有国际经济关系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亦即资本主义世界不同区域之间、美国同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和美国同西欧之间）的关系紧张，以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现在被称为第三、第四世界国家<sup>①</sup>之间的关系紧张，令人注目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是罕见的石油危机，和第三世界石油生产国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生的冲突。不但如此，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所涉及的方面还要广泛得多。最后，在资本主义世界同社会主义国家合作前景的问题上，又出现了新的情况。所有这些地区都受到干扰，在所有这些领域里人们今天都在艰难地寻求新的平衡，要预言其最后结果是十分困难的，条件还极不成熟。我们必须把意大利危机的具体特点放在这个框框里来考虑。我可以这样说，从我国的角度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到这次资本主义危机的多样性。我们认为这不只是一次经济危机，也是一次社会和政治危机，是旧的统治阶级领导能力亦即领导权的危机。

霍：最后一点相当重要。我认为现在对危机采取右翼的或者反动的解决办法的可能性，比三十年代初期要小些，各地的工人运动几乎都组织得更加完善，更富有战斗性，而统治阶级又都比过去软弱。但另一方面，也很难认为在这次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过程中不会发动对工人阶级的进攻，特别在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地区。你是否认为意大利和欧洲其它地方的工人运动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抗这种进攻呢？工人运动能否利用这次政治、社会和经济危机使自己比以前更强大起来呢？

那：如果只简单地回答“可以”两个字，也可能表现得过于乐观。我愿意在回答之前先说明一下，我也深信今天统治阶

---

<sup>①</sup>第四世界是指第三世界中缺少原料和能源的最贫穷落后的国家。这是意共的说法。——译者

级对危机作出右翼的、专制的、甚至法西斯式的反应，要比以往各个历史时期更为困难。然而，由于我们对工人运动被法西斯击败的历史教训记忆犹新，因此我们认为绝不能低估右翼解决办法的可能性，也许这种观点只反映了意大利共产党的特殊性，我们对这一点从谈话一开始就努力进行探索。我们必须经常注意防止为统治阶级发动反动的进攻或者反击创造条件的危险。

一九六九年以来，意大利工人阶级和左翼采取攻势并取得了进展，工人阶级开展了广泛的政治和经济运动，同时反动派也采取攻势，它们采用的方式是所谓的进行挑衅和制造紧张的战略，以及最野蛮的恐怖手段。我们总算平安无事地过来了，这是由于一方面我们对恐怖战略可能造成胆怯和不知何去何从的危险作出坚定的反应，另一方面我们又做了工作，防止右翼建立和巩固其群众基础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前进。我认为在目前社会危机尖锐复杂、政治经济危机严重的阶段，我们必须考虑到有可能围绕反对工人运动的右翼路线形成一个广泛的、有各种力量参加的社会集团。这种阴谋、这种反攻会如何发展呢？我认为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经济危机这种癌细胞的扩散会将中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推向右倾。

霍：例如小农场主和小商人。

那：尤其是中、小工业家，他们对工人的要求和劳动价格上涨的压力感受很深，同时因大垄断公司统治市场而造成的种种条件，使他们处境相当困难。

我们还要注意到劳动人民群众内部可能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在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在业工人同青年群众之间（这部分人数在增加，特别是失业的高中和大学毕业生），以及产业工人同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雇员之间或不同工资级别

和社会阶层的工人之间。

工人阶级同中间阶层联盟的路线以及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力量的政策（其目的是必须阻止他们在反动立场上联合起来），实质上都可能遇到严重的困难，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本身的团结也会遇到困难。这些是右翼的反民主阴谋可能介入的方面，虽然现在还难于确切说明这种介入可能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尽管如此，由于意大利近几年来反法西斯意识和行动大大恢复了，右翼阴谋采取赤裸裸的法西斯运动的形式，肯定不会那么容易。

霍：我想孤立新法西斯力量比解决可能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内部产生的矛盾还要容易一些，失业和通货膨胀对各个阶层都有不同影响。

那：那么你也认为失业和通货膨胀齐头并进会给工人阶级运动造成一些极其困难的问题？

霍：是的，我确信会如此。意共对这个十分严重而又具体的问题，有什么看法？

那：意大利工人运动为保持在业工人的生活水平，赢得了一些重要武器，在业工人现在面临着通货膨胀和企业或生产部门暂时性的危机。我指的武器就是规定工资应定期按生活费用作出调整的条款，这些条款最近按照新情况作了修改，争取到保证工资，等等。通货膨胀对其它社会阶层的打击更大，为首的自然是失业工人。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一点必须明确）更为有效的全面维护实际工资的活动和进一步改善在业工人条件的活动。但是作为一个工人运动，如果不将最大的注意力放在维护受到通货膨胀打击最大的人民群众和社会阶级的利益上，首先是失业工人和青年的利益上，那么就会犯错误。现在由于危机的缘故，这些人愈来愈难以找到工作和保障收入。

另一个问题是收入优厚的工人中存在着维护自己有利地位的趋势。与此相对的是，受剥夺最重的工人强烈要求缩小彼此间的差距和利益均分。这个问题在意大利的公营部门中，在国家机关、公营企业和地方企业的广大雇员群众中，尤为尖锐复杂。这些部门中，工资级别差距确实很大，存在许多完全不合理的差别和不平等情况，这是天主教民主党执政者和行政领导人二十多年来推行按工种、按类别作出特殊让步的政策所造成的。这种政策是天主教民主党建立权力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个事实是，公共行政机关和同它们一起的公共服务部门中大量雇员的提薪，以及中间阶层大批人更为普遍的增加收入，实际上这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经济发展途径的基础之一。它明显地推动了私人消费的大量增长，以及导致我们所看到的成为意大利经济发展特点的畸形发展。

回到我刚才讨论到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设法对公共和服务部门的工资结构进行改革、调整 and 平衡。我们必须 在工业、农业和第三部类所有不同工种工人的收入之间建立合理和平等的关系。从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以来，在我们的争取下，领取薪金人员和产业工人的条件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我们也使辅助劳动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全面增长，然而目前不仅在巩固这种趋势方面，而且在国民总收入中劳动收入的再分配方面也有问题。这个问题会给工人运动造成严重的困难和矛盾，尤其是这次危机会引起利益的重新调整并加强狭隘的利己观念，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行会主义，各个集团只关心本集团的利益。

霍：对，我们必须回顾列宁和葛兰西对“行会主义”的批评，阶级觉悟甚至同最有战斗性的小团体精神也不是一码事。

你刚才讲到总收入的停滞和下降甚至会导致个别部门内部

收入的再分配和损失，这是不是深刻危机的特征？你是否认为这就是如何前进和克服危机的核心所在？

那：我认为象你所说的，只有在为了使我国摆脱危机而制订的政策范围内，我们才能正确对待迄今所讨论的问题。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只有在大力革新经济和社会的路线，以克服危机为目标时，才能谈得上工人阶级内部收入的再分配和损失问题。在危机时期，统治阶级、靠资本主义大企业发财的阶级、同投机性收入和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特权的阶级，比平时更明显而且大大增加了。政府如果假心假意地只要求工人阶级在其内部作出牺牲和讲平均分配，而不去触动特权阶级，那么这样的政策，工人运动是不能接受的。

霍：好，但是意共对克服危机的前景有什么看法？也许部分克服这次危机的办法是象上次那样使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或许靠进一步控制实业家、投机商和放利者的收入？这样是否会意味着工人阶级接受从属地位？我们如何能以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方法来解决目前危机呢？这是不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那：是的，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这恰恰就是我们所期待的：使目前危机的克服不致象意大利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经历过的那样，单纯导致恢复资本主义经济传统的发展途径。这样的前景是以一个基本设想为依据的。工人阶级运动必须充分意识到有必要对资本主义危机所提出的问题作出积极的回答。

我们曾经就如何解释马克思关于危机的理论举行过几次多方面的讨论(我们最近也重新讨论了这些问题)，研究了马克思著作和后来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所提出的“崩溃论”还能不能再用了。我认为我党政策的依据是，我们深信，不应当期望资



本主义经济的崩溃会带来朝社会主义方向的变化。我们对资本主义危机进行的干预，必须能够确立起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以便围绕工人阶级建立有各种社会力量参加的集团，一种广泛的联盟体系，为我国提供能着手进行变革的新的政治领导。我们还要反对那种经常在工人阶级内部出现的行会主义，狭隘的小团体观念，使我们自己能对工人阶级的作用持积极看法。

霍：你这么讲是否想到了葛兰西？

那：是的，葛兰西的思想在指导我们，即：“新秩序”周报时期的葛兰西，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时期的葛兰西，对工人运动的失败进行思考的葛兰西，《狱中札记》时期的葛兰西。没有人比葛兰西更透彻地表述了对于工人阶级革命作用的这种积极看法，工人阶级在遇到生产问题时必须采取积极态度，以及工人阶级运动必须在组织生产和管理经济方面提出可供选择办法。葛兰西一九二四年写道，对于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来说，夺取政权首先意味着在管理国家生产力方面有胜过资本家的能力。葛兰西认为，这是工人阶级为夺取领导权，为使工人阶级成为新统治阶级而进行对抗和斗争的基本领域。这是我们在危机深刻的现阶段必须采取的方针。

如果工人运动只局限于指斥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和旧统治阶级的责任，单纯为维护工人利益而行动，那么它就把自己禁锢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内，没有活动的余地。这样就孤立了自己，并且会在政治上给右翼阴谋火上添油，右翼阴谋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反动派的反攻。事实上这种态度所主张的就是在旧的基础上复兴资本主义经济，不管复兴时间多么短暂。或者更糟的是，它可能使危机恶化，甚至可能导致出现社会崩溃和解体的现象。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我们对此十分警惕。

也许你记得葛兰西那篇最使人沉痛和激动人心的文章《反

对悲观主义》吧，文章谈到工人运动遭受失败以及法西斯即将胜利的岁月。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是造成意大利社会总解体的一个因素，虽然我们自己并不想成为这样一个因素。我认为工人运动应该牢记，在资本主义深刻危机时期，我们不要使自己成为社会解体的因素，而是要成为重建和革新社会的因素，遵循可以为社会主义变革开辟道路的路线。这样做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这就是意共愿同其它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一起寻找解决意大利危机出路的关键性的政治前提。

霍：意共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具体建议？

我们都同意资本主义危机的解决并不一定会对工人运动有利。我们已经有了三十年代的历史教训，当时右派从危机中得到了好处。现在难以看清的是如何使危机的解决能有利于走向社会主义。例如，三十年代象瑞典这样的工人运动帮助了本国资本主义克服危机。我不想低估瑞典社会的成就，但是这样一种瑞典式的前景是否能使意大利工人运动满意呢？

那：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认为不使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方式和领导发生质变，就不可能使意大利走出危机，在更健康、更坚实的基础上持久地发展意大利经济。因此我们并不是抽象地宣传社会主义的好处和优越性。如果我们的目标不是加剧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发展中的一切畸形和矛盾现象的那种暂时和虚幻的复苏，而是要使意大利经济取得不间断的、有机的和均衡的发展的前景，那么用恩里科·贝林格的话来说，我们就必须引入“社会主义因素”。我们必须改变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途径和领导，使之朝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我还必须马上补充说明，我们并不把自己局限在国内舞台上。我们充分意识到国外需要，意识到意大利同世界其他国家

的经济贸易关系和新的国际经济合作等问题的重要性。我们深信必须强烈要求意大利在国际分工中占有新的地位。我们相信这已成为迫切需要。意大利过去所占有的地位已经不行了。必须重新设计意大利的生产使之适应国外市场；使意大利同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的经济贸易关系取得新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在这一点上，你也许想回过头来讨论一下必须在我国开始的那种新型的发展。

霍：是的，你能谈一谈吗？

那：我们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必须将重点从发展强制性的、人为的和畸形的个人消费转变为发展社会消费。我们必须满足集体的大量需求，如修建公共住宅，改革和发展卫生事业，发展和改进公共交通，发展和改变教育结构等。同时我们还指出，必须加强迄今为止受到严重损害的生产活动，如农业和农业工业化，以及加强有助于南方工业化的生产资料生产等基本部门。实际上，随着科学和技术研究的大发展，一切有助于使意大利的生产结构和意大利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发生质的飞跃的部门都应当加强。

霍：这一切都十分积极有用……

那：但是这同走向社会主义又有什么关系呢？

霍：我也恰恰想问你这个问题。

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象表面看起来那么容易。下面可以算是部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所提出的用以解决危机的新发展政策，其社会目标是高就业率，将南方地区广大人民群众从落后和贫困中解放出来，以及使全国人民能过更美好、更文明和更有文化的生活方式，而不再过那种畸形的、异化的生活方式。难道这些全都与社会主义无关，与朝社会主义方向变革社会的目标无关吗？

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如果经济和社会结构、各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国家组织本身不发生重要变化，那么我们所考虑的新型经济发展就不可能实现。我指的是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措施是推行新发展政策必不可少的条件：农村发展新的生产和市场结构的改革措施；城市改变工厂区使用方式的改革措施；工业改革措施。在这点上，我们现时在意大利面临的主要不是新的国有化问题，因为我们的公有部分（主要采取了国家参与的形式）已经比任何其它资本主义国家都大了。然而我们面临的恰恰是需要对这些公有工业部门进行彻底的改革，使这些部门不是适应典型的大的垄断私有工业的行动准则，而是为适应整体的需要和新发展政策的方针。我还想到对国家机器的结构和作用进行一系列改变，其基本目标在于权力下放，发展区域和地方自治以及群众性的参与和监督。

广而言之，作为恢复旧的发展途径的替代办法，我们主张的新发展政策是确立一种有意识的领导，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部进程朝着有利于大众的方向前进。我们主张的解决危机的方法就是使生产机构重新广泛地恢复起来，作为满足国家需要和满足意大利参加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需要的新前景的一部分，使今后经济和社会生活能取得有条理、有计划和有领导的发展。这种观点是吸取了五十和六十年代发展杂乱无章的经验。我们指出上述需要是克服重重矛盾和不平衡状态的条件。

我们在谈到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有意识的领导时，我认为我们提到了社会主义的一个固有的基本要素，首先就是，用经典的提法来说，克服资本主义发展的无政府性质。

霍：我想你刚才谈的是意大利的具体情况，其特点是，一方面旧统治阶级的领导权和统治能力面临重大危机，另一方面又存在对经济进行新的有计划领导的某些办法，而这些办法却

没有在这方面得到运用。我在想，认为对社会的领导不作实质性的改变就不能解决危机的说法，有没有危险性。共产党人过去常犯的错误就是认为资本主义本身无法克服危机，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出路。但资本主义过去克服了危机，现在还可能做到这点；现在的问题是要在各种解决办法中作一番选择，而不是立刻就面临要么社会主义、要么大难临头的问题。

那，你要求澄清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我愿详细谈一谈。我认为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有意识的领导和调节的问题，同科学技术的进展一样，是当代国际上的重大课题，既涉及幅员广阔的地区内处于落后、贫困和饥饿状态的人民的未来，也涉及人类本身的命运。今天由于生态学平衡和个人与自然关系的日益严重的失调而使人类的命运受到威胁。但是我没有从中得出“要么社会主义，要么大难临头”的结论。我没有说唯一的出路只有在短期内用未知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社会主义。我个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说法。我们认为有必要进行世界性合作，使社会主义独特的、固有的要素，亦即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有意识的领导，能通过国际合作得到实施。在国际合作的情况下，落后和发展中国家能够起巨大作用，社会主义国家能够作出重要贡献，甚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有它的地位和发挥它的作用。

同样，我也想讲清楚，对意大利来说，即使国家体制和领导没有实质性的变动，经济也有可能复苏。我们并不排斥这种可能性，但是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复苏是短暂的，并且只会加深资本主义剥削和使社会的各种不平衡状态更加严重。其次，意大利危机不仅涉及经济，也涉及社会、政治和组织制度，甚至涉及思想和道德。要解决这样一种危机和克服我国经

济结构的弱点，当然必须对社会和国家领导进行深刻的变革。然而我们并不是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迅速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而是从劳动阶级可以更有效地参与社会和政治领导，以及将某些社会主义固有因素引入经济和社会机能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在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就是对经济进行规划或计划，工人阶级参加上下各级计划的决定，并占有决定性的地位。在这一前提下，我们不否认私人积极性，更不否认小企业的职能。我们认为即使到了社会主义，小企业也能发挥作用和占据应有的地位；但是我们要具体说明，在决定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上起主要作用的还应该是集体利益。

霍：是的，不管用什么办法解决危机，任何计划都必须大力强调工人阶级以决定性地位参加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根本性决定这个社会因素。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我们讨论的不是计划经济的纯技术性问题。要是没有工人阶级、劳动群众和人民力量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大动员，要想不诉诸强制手段而制定出有效的经济革新计划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意大利有过这样的经验：六十年代中左政府曾试图制订经济计划。这个计划基本上以失败告终，因为它遭到了大资本集团的激烈抵制，它们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有效公众监督，不执行官方制订的任何形式的纪律。相反地，中左政府的政策又恰恰要依靠大资本集团的和平合作。今天我们认为如果要为恢复生产机构和在新的基础上为重新组织全部经济和社会生活而进行必要的艰巨努力，就必须开始实行有效的计划经济政策。我们知道，除非同大资本集团进行面对面的斗争，限制它们的决策权，并在领导经济发展的决定性问题上给予劳动阶级足够

权力以进行干预，否则，计划经济政策是实行不了的。还需要更广泛地就参政和国家职能规定出新的范围，扩大工人和公民普遍参与决策进程的形式，扩大基层民主形式和由下面进行监督的可能性。事实上，意大利过去几年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的发展和具体的经验。

霍：我们再回过头来谈一谈意大利危机的特殊性，正如整个政府体制的失败所揭示的，意大利的危机基本上是一次领导权的危机。

那：我想这是对意大利危机的正确解释。但是，统治阶级领导权存在严重危机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已经完全失去了领导能力，也不意味着他们打算和平地放弃统治地位并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同时也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已经成功地对充分广泛的社会阶层建立了巩固的领导权。我们一方面看到统治阶级领导权的严重危机；另一方面无疑越来越多地确立工人阶级对其它社会阶层的领导权。斗争还在进行中。在我看来，在争夺领导权的这两种势力之间仍是真空地带。我们不能低估这样的事实，即意大利资本主义中最有眼力的集团意识到这一斗争的重要性，我们也不能低估它们可能采取的行动。菲亚特公司的董事长、工业家联合会主席乔瓦尼·阿涅利在六月十五日大选之后，就这方面发表了有象征意义的讲话，他明确指出：

“我们看到新的社会力量打算建立自己的领导权。对有关各方来说，这是有重大利害关系的”。

霍：最后想澄清一点。你讲到“工人阶级领导权”时，你说的“工人阶级”的定义是什么？是否按照经典的解释，指大工业的体力劳动者？现在这个词已不象五十年前那么明确了。

那：我们运用这个词必须首先注意不要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们认为，或想当然地认为工人阶级是清一色的，尤其在政

治思想和阶级觉悟上是清一色的。我们充分地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说，首先在工人阶级内部就存在着领导权的斗争。我们必须始终如一地为工人阶级工作和斗争，或者用更谦逊和更具体的说法，我们要为占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最广泛的阶层工作和斗争，使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作用和寄托在他们身上的领导作用。这就是说，我们不要存有丝毫的幻想。我认为我们现在讲的工人阶级，必须比过去的概念更广泛，也就是说，不只指创造剩余价值的体力劳动者，也包括其它阶层的劳动者，这些阶层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客观地位同工人阶级十分接近，他们的社会和政治觉悟水平使他们易于同工人阶级发生有效的联系。

最后，我们始终相信工人阶级只有通过它本身的组织，首先是通过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政党（当然不只是共产党）才能确立和掌握领导权。今天连这个问题也变得更加复杂了。我们认为应该由这些政党来保证代表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同工人阶级中最广泛的阶层直接发表意见和参政的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其次，我们必须更加明确，不能只限于由这些政党来讨论这个问题。难道工会运动没有为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作出过独特贡献吗？天主教组织现在也认为它们是工人运动中的一部分，难道我们不应该更仔细地看一看天主教组织可能作出的贡献吗？

### 三

霍：让我们从国际角度讨论一下目前的危机，各国解决本国危机的可能性究竟受到多大的限制？

那：首先我们不能认为可以用闭关自守或自给自足的办法来解决意大利的经济危机，这些办法都无视意大利同其它经济



区，特别是同意大利所在的先进资本主义集团保持全面关系的必要性。这就意味着意大利不能逃避在国际收支差额方面承担义务。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可以十分不同。一种方法认为意大利目前所处的劣势地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每当赤字达到危机程度，就采取限制性措施，以国际收支状况不允许政策变动为理由，阻止采用任何新的发展政策。然而也有另一种可以采取的方法。这包括纠正造成国际收支赤字急剧上升的国内原因，这些原因来自我国农业结构松散和生产力不足，进口物资的消费大量增加和资本外逃，同时还要设法加强意大利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主动性。

霍：确切地说来，这种方法包含哪些内容？

那：我已经提到有必要重新设计我们的出口构成，以便在国际分工中取得较为领先的地位，并争取同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建立新的日益密切的经济贸易关系。再加上在国民经济规划和城市革新规划的前提下，全面和合理地利用民族资源。这就是意大利走出危机的唯一道路。意大利有些集团将希望寄托在美国经济可能得到恢复上，希望资本主义经济，包括意大利经济在内，会随之全面好转，这种想法是徒然的。我们并不相信这种假设的建立在过去那样不稳固基础上的美国经济复苏是靠得住的，它总是使意大利经济再次处于微不足道的和从属的地位。此外我们认为，即使美国经济终于好转，可能也不会给西欧经济带来任何好处。意大利必须准备对付美国将世界危机转嫁给其它国家（包括西欧国家）头上的花招，同时也要准备对付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竞争和冲突加剧的趋势。

霍：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经济共同体起什么作用？

那：共同体一直承受我刚才提到的消极情况的影响，现在正遇到深刻的危机。尽管如此，共同体仍然有资格充当西欧亟

需取得的经济独立的发言人。现阶段世界危机将会导致美国重新确立和加强它对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地位。在这个威胁面前，欧洲经济共同体将会赞同欧洲自主和协调一致的发展，并支持进行共同抵制。这就是我们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进行斗争的路线。这种情况一方面要求我们大幅度地转向发展中国家，同欧洲大陆的所有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和积极促进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另一方面，也要求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结构和方针民主化。

霍：从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很难看到会有这样的变化。

那：困难当然很大。鉴于资本主义经济总危机的加深以及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国家彼此之间的竞争，意大利必然要面对保卫本国利益和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发挥自己的积极性的问题。同时，它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要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实行新政策，从而使共同体能发挥任何单个国家发挥不了的领导作用，这是很重要的。顺便说一下，应该着重指出，即使在欧洲共同体领导集团内部，也有一些人对美国在货币政策、贸易关系等方面称王称霸和使用高压手段感到不能容忍，并对此持批评态度。对欧洲议会中左翼力量的作用，以及工会和其它人民团体可以施加的压力，也不应低估。后者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活动和政策的制订都有影响。

霍：你当然知道英国在参加共同市场问题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左翼采取了反对的态度。

那：然而意大利左派过去对英国参加共同市场是乐观的，现在他们仍然是乐观的，理由是劳工运动在贵国是有影响的，同时英国的参加会使共同市场内部比较进步的观点得到加强。尽管共同体目前存在危机，我们仍然相信共同体在实际上是一种不可逆转的现实，因此必须尽一切努力使它朝着积极的方向

发展。必须考虑到世界上这个地区国家经济一体化的需要，并且采用民主的、进步的活动方式，同时必须严格控制那些不受单个国家管辖和控制的危险倾向，首先是大型多国公司的权力扩张。欧洲共同体内部的左翼力量和工人组织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但是我们不要存有轻而易举的幻想。我们可以看到，例如要协调工会斗争以反对多国公司并影响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政策是多么不容易。然而，不管我们走得多慢，这仍然是一条我们可以而且必须遵循的道路。

霍：你难道没有想到共同市场的机构和政策本身会对个别国家、尤其是意大利进行社会的、结构的和政治的变革设置障碍吗？

那：这也是我们为共同体民主变革而斗争的另一个理由。

霍：我同意你刚才讲的，意大利不可能靠闭关自守或自给自足来克服危机和重新取得进展。虽然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行动是在过去世界经济各自为政的时期……

那：而且是在幅员广阔和资源丰富的苏联。

霍：……今天单个国家已不能用各自为政的办法来找到出路。近二十年来，世界贸易的局面已经打开，并且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这种局面意味着凡是进行社会变革的国家要承受更大得多的外来经济压力。

那：但是，近四十年来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新的力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其中包括已成为工业大国的苏联，这也是事实。由于国际局势向缓和方向发展，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愈来愈密切。对一个着手进行变革的西欧国家来说，完全可以通过进一步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贸易和技术方面的联系来取得支持。这个国家在保持同西欧其它国家有机联系的同时，正在努力抵制那些为阻止它达到

目的而施加的外来压力。

然而，我不想低估为阻止象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开始新发展（这种新发展可以逐渐地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而可能施加的各种压力和障碍。同时我们也不能无视近几年来将我们进一步同西欧联系在一起十分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关系（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关系）。事实上这些历史关系在许多方面构成我们对意大利进行民主和社会主义革新看法的一个特点。我们在同其它关心推进意大利社会变革的力量一起发展我们的行动路线时，必须考虑到意大利地处欧洲以及这一点对我们采取行动会产生什么影响。

霍：你是否认为意大利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同整个西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依赖的？

那：是的。我并不认为我们还要回到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点。如果我没有记错，几年前这个问题曾经成为法国争论的焦点。根据这种论点，西欧国家必须全体同时协调一致地走向社会主义。各国如果朝社会主义方向进行社会变革，无疑需要花极大的力量同活跃于其它国家的左翼和民主力量加强联系和相互了解，以避免外来干预或明目张胆的干涉，这种干预或干涉会阻碍甚至中断变革进程。总的说来，有必要从实际出发采取行动，以减轻压力和减少外来干涉的理由和借口。

霍：你在讲到压力和可能干涉时，你是否也指设在这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那：当然。你知道，我们并没有提出意大利单方面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即使意共最终参加政府多数派也是一样。我们认为这个目标是不现实的。真正的问题是促进局势缓和，每个地区内部真正树立起缓和与和平共处精神，最终消除将欧洲分为军事集团的状况。

霍：据你看，前景如何？你对最近国际形势的变化作何评价？

那：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之前，国际局势以及欧洲和世界关系趋于缓和的重要性是无可争辩的。尤其无可争辩的是，美国和苏联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达成谅解的重要性，这种谅解是积极发展国际关系和建立和平共处体制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步骤。然而，这个进程不能也不应该只以美苏为主角。

目前，尤其在美国，对前几年出现的缓和政策抱怀疑态度的趋势日增，这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世界性危机和帝国主义危机的发展可能会危害这项政策。因此，首要的问题是坚持和加强缓和局势与和平共处的趋势。这是西方世界、欧洲和意大利民主地、和平地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基本条件。此外，这也是减少外来干涉可能性的基本条件，这种外来干涉的目的是想粉碎或阻挠我们正在意大利努力争取的变革进程。

霍：当前是什么东西威胁着局势的缓和？美苏之间会爆发核战争是难以置信的。现在世界和平已持续三十多年，这是本世纪为时最久的和平时期。但是在我看来，小国之间的冲突是个十分严重的危险，因为有可能将大国卷进去。

那：我同意你的意见，今天战争的威胁基本上采取地方冲突的形式，大国已经卷入了这些冲突（或正冒着卷入冲突的危险）。核武器的扩散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危险。

然而我考虑的不只是战争的局部性质或范围这种极端例子。我指的是，尤其考虑到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国际局势已经缓和，更不能认为和平共处和世界经济合作的前提已经完满地形成。我们也不能认为重新出现国际间敌对状态（包括各种形式的冷战）的一切威胁已经消除。我们不能忘记由于裁减军备问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以及大国之间没有停止核武器和新的恐怖和毁灭性武器的竞赛，局势的不断缓和和集体安全的持续进展受到严重的限制。

霍：由于葡萄牙已经发生的情况和西班牙可能发生的情况，希腊的事态演变和可能发生的进一步变化，以及意大利的前景，美国某些人士对北约在地中海的政治基地有可能瓦解感到十分惊惶。你们意大利人是使美国担心的中心问题。

那：我们在有关欧洲和地中海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值得密切注意，因为这种立场并不只是在口头上安抚那些害怕欧洲会发生深刻政治变化的力量（诸如那些负责制定美国政府政策的人）。这种立场更主要的是表达我们对需要给予澄清的一些紧急要求和担心的看法。我指的当然是我们提出的争取一个既不反苏也不反美的西欧这个口号。我们认为完全有可能设想西欧不再在经济上或政治上依附美国，但是这并不等于提出在政治上同美国断绝关系或发生冲突，或在经济上使美国在西欧无立足之地的问题。特别在地中海问题上，我们采取的立场照顾到一切有关方面的利益；这种立场并不是片面地号召把美国从西欧赶出去，即使它确实要为保障地中海所有国家的独立与和平而找出解决办法。

我们意识到美国的某些集团十分害怕南欧即将落在共产党手里。但显然这只是一种成见，而不是对欧洲地区目前发生的或实际可能发生的变化作出严肃的政治估计。我们希望南欧各国政府内部会产生向左转的变化，但美国对这种可能性看得如此可怕是荒唐可笑的。

霍：美国经济已证明是最能够经受住当前经济危机的。一般说来，存在低估美国经济力量的趋势。但是美国的国际地位正在削弱。作为一个失去帝国地位的国家的公民，我充分意识到帝国地位的丢失对一国国内政策会有什么影响。美国这个世

界帝国在过去二十五年中居于统治地位，它在军事上和经济上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五十年代以来，国际局势起了变化，这种变化当前更加深刻，这可能造成有害的后果。美国对意大利进一步左转的前景可能产生某种反应（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共主义），你对此有什么评价？

那：虽然某些变革可能有损于美国，我们仍然希望在美国的政治领导人中间，现实主义和理智会占上风。历史上也有先例可以借鉴。至于美国某些集团对意大利政治领导可能向左转所采取的态度，给我这样的印象，即在官方和大部分公众舆论中流行的对于意大利共产党政策的看法，仍然是不合时代的和拙劣的，并且达到令人不能置信的程度。但是在新闻界、比较开明的文化界和自由政治界内部，也有相反的看法；他们倾向于实事求是地看待意大利共产党的政策，并且对这种不可否认的独特性和自主性的现实加深了解。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满足美国民主人士想更好地了解我们的要求，使他们熟悉我们党的政策的真相，不加掩饰，也不予以美化，同时驳斥那种蓄意歪曲我党的历史形象和战略的做法。

霍：在目前危机阶段一再遇到的问题，都是有关欧洲和发达国家的问题。过去几年，在从事革命的集团中，存在着某种“唯第三世界论”的倾向。现在旧世界工业中心出现的问题，连同其变革问题，再次成为大家注意的中心。尽管如此，不能把这个问题同整个世界的问题分开来。

那：我认为必须讲清楚（我们认为这样讲是很有把握的），即除非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彻底改变政策，将它们巨大的财富、生产能力、科学技术和组织经验为世界范围的合作服务，那么目前人类面临的真正严重的问题（首先是世界广大地区落后、贫困和饥饿等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只有在这个

前提下，加上第三、第四世界国家在经济政治上独立和在发展上完全自主，才能保证改善落后地区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这就意味着目前工业国和落后国家之间关系的体系——帝国主义的全部政策是成问题的。总的说来，在继续保持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依附状况的贸易关系的体系中，意大利自然也是先进国家集团的组成部分。我在前面讲过，我们正努力争取意大利在国际倡议方面采取新的方针。作为这个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正在努力加强意大利工人运动同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系，以及同前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现领导的联系。

劳工运动影响的日益增长，以及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朝社会主义方向的变化，不仅符合欧洲工人阶级的要求，符合世界这个地区在目前危机的沉重压力下迫切需要变革的要求，同时也符合第三和第四世界人民和国家的利益，符合普遍要求和平与进步的愿望。

最后我还想讲一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变革的进程的开端，也是克服以往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局限性，扩大世界社会主义前景并使之焕然一新的必要条件。

#### 四

霍：我们对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谈得还不够。我想先请问一下，关于左派对这种立场的批评，你是怎么看的？

那：目前批评我们的人所反对的是，例如，他们认为结构改革的道路是不实际的，通过经济和社会的部分结构变化来开辟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他们用论战的口气提醒我们说，民主和目前意大利国家机器无论如何会保留它们的阶级性。这些人无视我们几十年来的发展，并歪曲我们的立场。他



们重复首先由当时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罗杰·加罗迪在我们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提出的那种教条主义式的反对意见。但他们无视，譬如说，我们在六十年代初同社会党领导人的争论。当时社会党领导人认为意大利民主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通过民主进程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是不成问题的，看来他们低估了意大利现有民主形式的极为现实的局限性和潜在的危險性。

我们一直认为，统治阶级随时都可能决定公开向民主机构进攻，并抛弃代议制民主的形式。而且，我们也一直注意到，统治阶级的政策也可以不在实际上摧毁代议制民主形式的情况下转向专制主义。即使目前我们仍然认为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机构其权力事实上是有限的，有关国计民生的根本性决定是不受议会控制的。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民主的看法，从来也不是为它进行陈腐的辩解，相反地，我们认为，这种政治民主总是带有象意大利这样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所固有的局限性和危險性。尽管如此，我们唯一现实的选择是要超越这种民主的局限性，为赋予它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即在经济上和社会上更加先进的形式和内容）而斗争，并在这个基础上向着社会主义前进。

霍：尽管如此，象意大利所选择的那种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引起了许多问题和困难，我想听听你对这方面的看法。我想到智利的经验，不只是你刚才提到过的，统治阶级有可能对代议制机构进行摧毁性的打击。由于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要穿越议会民主的领域，先决条件是要有政治联盟和竞选联盟。智利的经验表明，要将竞选联盟转变为能够推行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政府会遇到多大的困难。智利人民团结阵线的各个政党都有不同的特殊利益，在阿连德取得胜利之后这些利益都原封未

动。我在智利看到这些势力对解决诸如土改等重大问题施加了多大的压力。

那：我们当然知道，要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必须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我们片刻也没有想过我们会有解决所有困难的现成方案，也不自以为对每个问题都有了现成的答案。这一点要讲清楚。我们处身于一个进程之中。你提到智利经验是十分正确的，因为我们怀着极大的激情注视着智利的经验，并一再回顾它的悲惨结局。当然它提出了从竞选联盟转变为能够推行变革进程的人民政府的问题。但是我应该说，这些联盟一旦成为政府，它能否起作用，首先要看参加联盟的力量事先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如果今天意大利左派能参与执政，我相信他们获得成功的机会，一定会大大超过一九四八年意共和社会党联盟所能取得的成功，如果当时人民阵线取胜的话。从那时起，两党都作了持续的努力，积累了经验，有时也有尖锐的磨擦，这些磨擦使意大利两个主要政党之间，在对意大利社会朝社会主义方向变革的进程的认识更加接近和一致。现在还有不少方面需要作进一步的澄清；但不管怎样，两党之间已经达成的谅解，是朝两党共同承担政府职责的方向迈出了可靠的一步。

如果要使竞选联盟成功地过渡到政府的改革行动，那么同样重要的是，我刚才提到的准备过程不应只局限于上层。我深信在意大利，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这一过程已经深化，已渗入到广大群众的公民意识和政治觉悟之中，群众的广泛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共产党和社会党选民的范围。我想到最近关于工会统一、反法西斯行动等经验，天主教各种力量对这些运动所作的贡献，我也想到在城镇、学校等地民主参政的多种形式，以及群众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有力支持、他们的组织

性和纪律性。我认为这一切都使我国成为民主发展最成熟的国家之一。我认为这些发展可以使人民力量联盟在采取有效的政府行动时能发挥十分积极的作用。

但是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联盟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在获悉智利经验的悲惨结局后马上提出的问题。你也知道，当时恩里科·贝林格强调，必须使意大利的政府和政治领导不仅仅建立在左派联盟的基础上，即共产党和社会党联盟的基础上，而应使这一联盟具有不同的和远为广泛的基础。这就是甚至在意大利国外也脍炙人口的“历史性妥协”的前提。

霍：对，在这方面，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贝林格自己说过，不应把“历史性妥协”的主张仅仅看成是一种政治联盟，而应看成是超出左翼的范围，调动更为广泛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的力量。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代表如此广泛的社会阶层的政府，在面临它所负责的不同社会阶级和集团之间客观上的矛盾和利害冲突时，应该怎么行动。前面你在谈到目前经济危机时，提到了产生这些矛盾的可能性。自然，这个问题并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立宪道路所独有的。我们看到葡萄牙的情况，任何一种社会变革的进程都会出现类似问题。应该怎么办呢？一个进步政府如何能避免它赖以支持的主要社会力量之间的分裂？

那：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历史性妥协”的范围内加以探讨。假如参加人民民主运动的各种思潮，为了使国家有一个强有力的、有权威的领导班子，来处理一些重大问题和推行复杂的变革进程，而达成了十分广泛的协议（通过使各种不同的立场趋于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象你所说的那样，政府的社会基础内部的矛盾，会比单由左翼力量组成的政府复杂得多。但我并不这样看。

首先应该强调，我们的建议是深信对意大利社会进行深刻变革的客观需要，已成为解决折磨着我国的危机的唯一出路，意大利绝大多数人民，不仅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也包括中产阶级的广泛阶层在内，都普遍要求进行这种根本性的改革。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我们的假设也就不能成立。如果联盟内部或多或少的一部分重要力量无意使联盟获得成功，那么要依靠最广泛的联盟来推行革新进程的可能性，事实上也就成为无稽之谈了。我们相信支持意大利社会变革进程的力量是存在的，今后各个阶段怎么做，结果如何，最终将由参加广泛联盟的各种力量通过共同的经历来加以阐明。当然，这种前景并不抹煞在确定改革活动的实际内容和具体性质时，在政府赖以支持的各种阶级和社会集团之间，还会产生带有社会性质的特殊矛盾。对这些可能发生的情况确实没有现成的答案。问题在于对各项改革措施和对先前存在的均势的每一个变化，都要尽量取得广泛的一致意见。为达到这个目的，一个能代表所有民主政治传统和思潮的政府，当然成功的机会更大。再者，如果在改良主义联盟的社会基础内部出现矛盾，我们应记住葛兰西的意见：工人阶级要获得对其它社会集团的领导权，其先决条件是重视其它集团的利益和倾向，工人阶级毫不踌躇地“作出经济行会性质的牺牲”，“通过妥协取得某种均势”。

霍：你说没有什么现成的公式。我还不能肯定我是否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先例是存在的；我认为至少有一个先例，就是列宁对同农民结成联盟问题所持的态度。当列宁看到农民不再打算跟他走，他就改变了政策，因为他知道没有广泛联盟就不可能再前进。他选择了新经济政策作为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不惜以停止自己的政策作为代价。我认为即使在很不相同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即如何将不同利益的各个阶级团

结在进行变革的共同纲领的周围。

那：你强调在方法上有具体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可以借鉴，这是对的；我所说的没有现成公式是指对具体问题和新问题没有事先准备好的答案。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考虑到今天提出意大利工人阶级联盟问题的角度同三十年前大不相同，因为社会阶级划分出现了完全新的情况。

霍：我完全同意这一点。你认为意大利社会新的社会阶级划分在那些方面使工人阶级联盟问题发生变化？

那：是这样的，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问题已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同农民或农村半无产阶级联盟的问题；根本问题已成为同意大利近几十年来迅速增长的属于城市非无产阶级的各阶层结成各种联盟的问题。我指的是同中小生产者各阶层的联盟，以及同从事第三部类活动的城市中产阶级各阶层的联盟；我主要考虑的是国内急剧增长的白领工人和知识分子队伍。知识分子群众由于他们同生产过程的关系不同，社会职能不同，收入水平不同，本身具有极大的混杂性。有关城市非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的问题是十分复杂的，无论从理论方面（正如最近在关于“中产阶级”特别是关于“白领小资产阶级”问题上进行的辩论所表明的，对这些阶级的定义至今还存在严重分歧），还是从工人阶级运动必须达到的政策水平来讲都是这样。

最大的问题也许是如何处理由于城市畸形的、半寄生性、半投机性的发展，以及由于某些公有经济部门的病态发展而扩大的那些集团。我在前面提到过，公职人员之间工资的悬殊和政府行政机关的寄生性和分崩离析现象，已成为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内部的棘手问题。我们在谈到工人阶级的联盟政策时，无论如何都应该讲清楚，我们指的政策是设想它可以改变事物的现状，不只是为争取整个中间阶层的支持而巩固既定的立场。

我们认为有必要也有可能将这些集团中有决定性意义的一部分人争取过来，希望他们能改变目前的状况，从社会和人道的角度来看，这种前景是积极的和进步的，尽管某些集团为此必须放弃某些属于经济行会性质的特权。

霍：我的印象是我们是在同时谈论两种论点。我们是从意大利的具体条件出发，同时也是作为一个更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来讨论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因而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提出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多大程度上单纯是意大利的道路，具体限于意大利一个国家？

那：我们在讲到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时，主要想强调这样一点，即我们党有必要也有义务对有关走向社会主义以及社会的社会主义变革等论点进行独立自主的探索。我们要着重指出问题的由来及其民族特点。不应该忘记，我们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重申这一立场的，苏共二十大在理论上明确提出走向社会主义可以有不同的道路、民族道路的论点。然而今天，我们不可避免地必须考虑我们两人刚才讨论到的所有问题，即关于意大利和其它国家之间、意大利的形势同其它国家特别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势之间，日益增多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难道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再讲民族特点了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意大利的形势仍然有自己的特殊性和历史特点，这些特点并没有由于意大利社会发生的变化而消失。

霍：你能否对意大利形势的特殊性讲得更明确一些？

那：在意大利还存在南方问题，还存在天主教问题。意大利政治力量的阵容同其它欧洲国家大不相同。其它国家并没有类似信仰天主教的政党所提出的问题，这个党现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天主教民主党在农民和人民群众中是有根基的，并有反法西斯的传统，但过去几十年来它却成了资本主义统治

阶级，即大资产阶级的忠实代言人。我们有一个具有牢固统一传统的社会党，它朝气蓬勃地投身于有效地进行社会变革的斗争中。我不想过多地列举这方面的例子。但是还有一点应该包括在意大利的特点之内，即多年来长期分裂的工会运动现在又重新组成了有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天主教徒和其它人参加的强大的劳工运动。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宪法远比西欧其它国家先进，甚至从改革的指导原则和方针来说，它所指出的变革方向，同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是完全一致的。毫无疑问，我们的战略，亦即意大利为社会主义斗争的各种力量的共同战略，必须建立在所有上述特点的基础上。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同时还要考虑到一系列的国际关系和压力，这方面的问题要比二十年前多得多，这也说明在意大利共和意社会党关于欧洲范围的战略和具体政治主张得以有力开展之前，意大利是不会向社会主义前进的。

最后，要看我们关于通过民主走向社会主义的运动的观点，或关于民主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观点，在某些方面除了合乎意大利的具体情况外，是否普遍有效。换句话说，是否可以把这些方面看成是西欧其它国家走向社会主义进程的组成部分。我的回答是十分肯定的。事实上，其它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和左翼运动也独立地在理论观点和战略抉择方面得出了同意大利的共产党和社会党类似的观点和抉择。因此，一方面我们不应无视某些不可避免的差异和特点，不应要求在不同的情况下也必须采用我们全部观点或政治目标和计划中的目标。同时，我们可以说，西欧各国在探索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方面，存在着并且应当有一个共同的基础。

霍：你强调西欧走向社会主义的进程的共同的民主特点，能否再讲具体一些？

那，我认为我们面临的基本任务是在整个民主进程中确立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必然要包括几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不仅应当与进行深刻结构改革的目标相符合，并且实际上对重新取得广泛的一致意见和在建立新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增强其民主性质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在寻求更有效的民主参政形式和完全接受诸如尊重反对派的权利和议会中多数与少数轮流交替的辩证关系等原则方面，必须承认政治、思想和文化贡献的多元性和承认市民社会中各种形式的自治性。我们认为这是组织民主生活的一种表现，不能将它抛弃。这明显地包含着必须坚决和彻底克服那种认为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变革社会的进程中，只有共产党才能居于领导地位的意见。

霍：我有一点还不清楚，我将尽量讲得确切一些。西欧国家究竟有什么共同条件使得那里朝社会主义的进展可能和必然同中欧和其它地方不同？值得回顾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对多党制民主所作的尝试失败了。总之，你的看法是否只限于那些具有一定工业发展水平和特有的多党政治和组织制度传统的国家？

那：我相信，在任何国家，社会主义变革的进程以及社会主义的体制必须建立在意见一致和民主参政的广泛基础上，而不论其具体表现形式如何。在这方面，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都要经过检查和审议。

我所提到的在走向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方面需要坚持的原则和民主生活方式，具体指的是产生资产阶级民主的西欧国家，那里的代议制机构多少已有牢固的传统，并且各种民主、思想、文化和政治潮流多少可以自由活动。这些是西欧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一些共同出发点，加上这些国家在结构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以下特点：社会阶级划分都比较复



杂，在无产阶级和控制着基本生产资料的大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为数相当多的中间集团。

霍：我还有点茫然不解，因为我们在讨论中将几种不同的论点搅混了。首先是历史因素，也即指具有老的资产阶级文明传统的国家，历史上就存在着实行政党多元化和享有某种精神和文化生活等等的市民社会。譬如拿荷兰和英国的变革来说，不考虑到这些情况就会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这样的历史背景同葡萄牙的情况就关系不大；当然我们不能说葡萄牙是个有悠久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国家。

那：葡萄牙绝不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唯一建立起法西斯反动政权和民主自由长期受到压制的国家。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和希腊过去都有过这种情况，自然对这些国家各自的历史传统和民主惯例还可以进行详细的讨论。然而事实说明，一旦法西斯政权被推翻，又会出现要求根据贡献的多元化和不同思想和政治潮流的交锋来建立公民民主生活，以及恢复代议制民主机构的基本条件。葡萄牙在许多方面显然有它的特殊性：如法西斯政权被推翻的方式，武装部队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尤其是它在推翻法西斯政权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最后一点，武装部队在新政府中所承担的职责。但是葡萄牙现在也有各种力量在政治舞台上活动，其中只有一些力量在反法西斯斗争中起过作用，然而现在各种力量都有自己的影响并可以通过竞选和政治进程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另一点也不是偶然的，就是在民主竞选和选出代表制议会的问题上达成了共同协议，即使议会的任务只局限于起草宪法。

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和受社会主义思想鼓舞的各种力量，尽管彼此间存在严重分歧，但在如何处理民主和社会主义关系问题上，都面临着几个重要的共同性问题。因此，我们意大利共

共产党人不能只关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讨论自己的问题，为自己的路线辩护，认为它只在意大利行之有效，而对其它国家出现的严重情况袖手旁观，或者只是认为各人在自己家里想怎么干都可以。今后西欧无论哪个共产党，就有关民主和社会主义关系的一些基本问题作出的抉择，都直接影响到其它西欧国家政治斗争的道路。因此我们认为自己有不可逃避的责任，提出不只对我们自己而且对所有共产党人都行之有效的原则立场，不管这些共产党人在哪个西欧国家活动，即使我们承认对其它国家的情况由于缺乏第一手资料或了解得不透彻而有可能犯错误。

霍：你在谈到不只是意共独特的原则立场时，你是否考虑到其它国家的共产党呢？

那：我指的是欧洲其它不少共产党制订的立场，以及有几个国家的各种左翼力量在实质性问题达成的协议。法国共产党独立地阐明了自己的立场，然后同社会党人和激进党派建立工作联盟，以起草政府的共同纲领。这反应了法国和法国左派特有的问题。法国整个政治情况是同意大利大不相同的。然而，我们从共同纲领以及法国左派内部关于民主问题和民主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上的辩论中，看到它的原则立场同意大利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原则立场实质上是相似的。

霍：我刚才想说的是，在我们的讨论中，同西欧国家历史传统问题结合在一起的，还有另一种社会性因素。也许主要是由于这种因素，才需要建立广泛的民主联盟，因为尽管各国共产党都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它们如果不煞费苦心去争取其它阶级和组织的同意和参加，就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变革。我认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一点也适用于葡萄牙。

那：以葡萄牙而论，鉴于其它西欧国家拥有更现代化和更

丰富的社会——经济结构，更巩固的资产阶级民主传统，因此正确的做法（有些人已经这么做了）是既要强调葡萄牙同其它西欧国家的不同点，同时也不能将葡萄牙的情况简单地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相比。

你在提问中谈到的“社会”问题，在西欧更为先进的国家内，当然要比葡萄牙复杂得多。葡萄牙的主要问题是同农民群众联盟问题。讨论的焦点是如何使具体的社会联盟问题用政治方式表现出来并加以解决。在葡萄牙，过去可能认为解放后变革的进程，可以得到农民，从而也就是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不一定要在代议制民主的范围内通过各政党的联盟才能得到这种支持。我指的是提出由武装力量同人民建立联盟以及建议撇开各党派之间的调解来发展民主形式的那个时期。然而，由此造成的社会和政治的严重创伤，危及一切民主进展和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应当避免这种毫无保障的表面和一般化的做法；不过，即使在葡萄牙这种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如果要通过民主进程朝社会主义方向变革，那么某种过渡也是必不可少的。

**霍：**那么在你看来，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它们继承下来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性质等内在原因，必须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

**那：**是的。且让我们看一看一些历史教训吧。你在前面谈到，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多党政治的主张从来没有获得成功。你也注意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所有东欧和中欧国家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于我们认为意大利和西欧向社会主义发展和朝社会主义方向变革所应具有的特点。确实，历史告诉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是通过各政党自由竞争的多元制取得成功的，是在充分行使政治自

由权利，在高度发达的市民社会和各种社会、思想、文化的压力与主张的丰富自由的辩证关系的广泛范围内建立起来的。但我们的答复是，这仍然是我们的目标，因为历史也告诉我们，迄今为止西欧也还没有一个国家通过俄国道路或类似苏联的模式成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这决不是偶然的。各国的起点、条件和传统都具有决定性的分量，就象各国的历史情况和国际关系也有重要影响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存在着尖锐的（或表面上尖锐的）革命形势的西欧国家，它们仿效十月革命的榜样为夺取政权所作的一切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了，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随后，在东欧和中欧开始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甚至在某些资本主义已经有所发展和具有相当程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国家，也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我指的是捷克）；但是这只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形成的局面及其反响完全是一种例外，并且是不可能重新出现的。

根据上述历史经验，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和平环境中，意大利和西欧走向社会主义变革的唯一现实道路，就是在民主进程的范围内进行斗争，扩大工人阶级联盟，取得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并最后在进一步发展民主的范围内逐步改变经济和社会结构。这是适应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性和符合象我们这样的国家所具有的政治和文化特点的唯一道路。

至于其它情况，即使有可能在意大利这样的国家用压制民主自由和多元制传统的手段使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和建立起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倒要问一问，建设社会主义的代价是什么：这种做法对建设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会有多大影响？作为自由和民主准则的最高表现的社会主义思想，我指的是真正的而不只是形式上的最高表现，在实践中又能走多远？

霍：难道你不认为你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看法明显地受到西欧具体历史和传统制度的影响？因而你过分强调了它们的普遍效力？

那：请允许我引用陶里亚蒂的一句话来回答，我认为这句话是美妙和重要的：“今日西方的民主机构和制度并不是历史的终点”。这并不是指这些民主机构和制度需要进一步民主化。“我们并不想从民主中取走什么，只是想加进去许多东西”，加进去的是：工人监督和直接参加组织生产的新形式，互助性的自治组织和市民生活中各个领域的集体监督，这种市民生活会逐步替代目前快要窒息的国家机器。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们并不只是口头上宣布一下我们打算干什么。老是追问我们究竟有没有诚意，追问我们维护和发展民主的诺言会不会由于某种心理上的克制而变卦，或暗示我们这样做不过是为掩饰事先筹划好的突然袭击而设下的锦囊妙计，这是毫无意义的。近几十年来，我党致力于教育千百万人民懂得自由的意义，体验民主和实践民主并动员千百万人民为维护和发展民主而斗争。就是这样，我们党同通过民主走向社会主义的前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我们那怕只要片刻放弃这条道路，就会使党同追随我们的广大群众的关系遇到不可克服的危机。

霍：我们现在能否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来讨论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对意大利共产党来说，基本问题是不慌不忙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如果不考虑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变革的经验，那么要过渡到社会主义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不知道你是否也是属于那些否定上述经验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暂且让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谈吧。在你看来，有没有可能对比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便从中吸取教益？姑且不谈产生这些经验的历史

环境，难道从事采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人不能从中受到教益吗？

那：对那些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发生大变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或正在建立的社会来说，有人否定这种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有人却相反，维护这种经验的社会主义性质，我认为我们仍然过于热中于两者之间的争执。我们不能陷于这种对立的或初级的辩论。我的意见是，否定近半个世纪以来欧洲和其它大陆在工人党和共产党领导下完成的变革进程的社会主义性质是荒谬的。这不是一个吹捧这些社会如何纯洁和完整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理想的问题，也不是一个要想从中提炼出一种社会主义最完美的模式的问题。迄今为止，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都是出于一定的历史条件，通过某种全国性的伟大革命，在不同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并且具有正反两方面的特点。未来的经验必然会不同，因为它们将在不同于苏联和别处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产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有可能也有必要克服苏联和其它国家变革的某些局限性，并且避免某些危险的消极面。我们认为基本的消极面是压制个人自由，以及对组织和发展公众民主生活的可能性加以限制，苏联和其它地方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在不同程度上和在不同的时刻都具有这些特点。迄今最引人注目地承认这方面的局限性和畸形发展的，是苏联共产党自己，它在二十大提到斯大林主义时期的情况时谈了这个问题。然而，当时对斯大林主义或斯大林时期现象的分析是十分值得讨论的。对随后不仅为克服斯大林时期最糟糕的、最严重的畸形发展，并且为克服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方面表现出来的体制上的局限性所作的努力，也是十分值得讨论的。

总之，问题在于要进一步研究这些经验的成绩和缺点，也就是说，我们不能限于要么一股脑儿加以谴责，要么维护它们

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也不是说要一股脑儿加以歌颂，因为至少从意共内部来说，这种态度久已不存在了。

霍：贵党党员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一向都有频繁的人员往来和政治联系，对吗？

那：我国工人阶级中最先进的分子绝对不会忘记在世界上某个地方社会主义终于成为现实、成为光彩夺目的现实和指明方向的灯塔所包含的重要意义。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尤其是法西斯统治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解放以后的头几年和冷战年代，它对意大利工人阶级最先进阶层的觉悟和斗争都有十分强烈的影响。我们不能无视同社会主义世界（尤其是同苏联各族人民）在思想上的联系和感情上的团结一致，它在我们广大的党员和工人群众中是根深蒂固的。我们也不能同意无视和否定苏联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维护和平的斗争中所起的国际作用。但是多年来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采取一种导致或倾向于对现存社会主义社会不分好赖乱加吹捧的态度。几年来，我们在对这些社会作出判断时，既看到它们的积极面，也看到它们的消极面。然而我们仍有必要从历史和批判的角度加深对这些经验的了解。意大利社会党人在这方面也要明智一些，尤其是那些对苏联作出荒诞无稽的结论，轻率地把苏联现实情况说成是警察国家的人。

我们有必要对一些具体情况作进一步的研究，这些情况引起了许多争论和疑问，但却是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发展的特点。尽管意大利和其它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朝社会主义方向进行变革的条件完全不同，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取得教益。我尤其指近五十年来计划经济的经验，先从苏联开始，随后好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同的时期都实行了这种计划经济。在研究这些经验时，我相信将来我们迟早也会遇到这些问题，我应该说，这

些是属于理论性和政治性的问题，我们必须正视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方面所作的尝试，所犯的错误，所进行的争论和选择，以及所取得的成绩，这样做恰恰是为了使我们能够确信可以找出与过去不同的解决办法。我们还没有充分发挥力量开展对这方面的探索和批判性的回顾。

霍：你明确地提到社会主义不能只有一种模式，应该说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有不同的模式和不同的方式。在一些具有更为先进的资产阶级文明传统和丰富的资产阶级民主遗产的国家，为维护这种遗产的基本因素而努力是必要的。这就产生了有关革命社会内部辩证关系的重要问题。这些革命社会一方面要同过去决裂，一方面又要在社会内部保持某些因素。这个问题是到处存在的。我深信共产党中国是十分中国化的，就象过去年代革命的法国是十分法国化的一样。那么据你看，意大利在这方面会是什么情况呢？

那：事实上我们讨论的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问题，而是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或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新经验的可能性问题，这也是历史的需要。如果要研究的不只是欧洲，也包括世界其它地区迄今为止所取得的经验，那就难以将它们归纳为一、两个模式。同样，关于其它各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前景，我想我们应该注意不要搞成只有一个或几个要大家依样画葫芦的模式。就连我们谈得很多的欧洲国家，尽管它们在许多方面情况十分相似，我们也没有提出由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共同制订出独一无二的模式的问题。我们认为，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式和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的类型，可以并应该发展某些带有共同性的需要和方针。此外，我们认为还有必要明确指出同别国以往的经验不同之处，这对弄清我们自己的目标也是必要的。我们深信（你们也可以相信），要开始社会经济的新发展



和用社会主义方式变革我们这样的社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对上述问题及有关思想和政治含义的讨论，可以而且应该继续进行下去，也可以在欧洲范围内进行讨论，以期对我们自己的前景作出更清楚的阐述。然而，这种讨论如果超过某种限度，那么我们就有冒玩智力游戏的危险；我们当然不想犯错误，试图在世界上搞样板。

关于同过去的关系问题，我认为我们前面谈过的对西欧国家的看法同下面这一点很有关系：要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变革社会，需要建立在各国以往历史中最有成效的趋向和成就的基础上（这也包括地区史在内，我是指我们所属的欧洲地区的历史）。

霍：或许还会发现过去没有意识到的历史潜力？

那：当然。就意大利来讲，我们从葛兰西那里得到一些启发性的意见。例如，贝林格在上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采纳了葛兰西认为意大利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有它的积极面的看法。他强调我国文化和我国人民面向全球的倾向，过去只发挥了部分作用，今后由于国内新的统治阶级承诺将意大利的社会变革同与日俱增的多种形式的世界性合作运动联系起来（这一点确实是十分必要的），上述倾向能够得到充分发展。

对于同过去协调的问题，特别是同我国文化传统协调的问题，一直是我们的运动久经思考的问题。我可以说这个问题在原则上早已解决了。不能把文化革命和新文化的形成，看成是对文化遗产不分精华糟粕一概予以否定；不能以一张白纸作为前提。对于民族遗产，从整体来说，不能简单地不加批判地继承。问题在于对过去历史要进行选择，要辨明那些是值得恢复的倾向和课题，并要确定一种方法、一种最适当的批判态度来作出评价。

意大利共产党已着手对意大利历史和文化的进步民主传统

进行仔细的考察，无论是在两次大战期间，反法西斯斗争时期，还是意共作为全国性大党酝酿其新战略的时期。在解放以后和五十年代，意共又在更广泛的范围里努力重新同上述民族传统联系起来，特别是同民族文化传统相协调。我认为这种努力总的方面是正确的，是不容争议的。但是对某些具体条件和具体选择是可以争论的，对于涉及政治文化历史的某些方面偶尔采取的过于简单和肤浅的做法也是可以争论的。

今天，关于同民族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还要问一问：这个问题的条件有没有改变？在意大利，二十五年前，外国商品的流通，外国影响和文化方式的传播是十分有限的。当时意大利的文化生活相对来说还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因此同民族文化传统协调的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和影响。但是今天，象我们这样的国家，就必须考虑到国际文化联系和世界思想市场的空前扩展。现在，象我们这样的党，就必须密切注意国外的思想和文化影响，同时精选出其中对群众（尤其是青年群众）文化修养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因素。

**霍：**当然问题是十分复杂的，没有什么迎刃而解的办法。我认为在探索社会变革的问题上，要避免象博物馆馆长那样，专挑一些需要保藏的东西。采取保存主义的态度是重要的，对物质遗产、艺术财富、历史古迹，如象威尼斯这样的城市，尤其重要（我们知道在意大利这些方面无人过问）。但是不仅有要保存什么，还有不要保存什么的问题。

**那：**那么这就不只是个保存问题，而是在文化发展的新周期中，如何恢复最珍贵的民族遗产问题。

**霍：**正是这样，我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没有提出什么解决办法，因为没有什么现成的答案。尽管如此，我还是深信社会变革的进程同时包括两个方面，而人们对同过去关系的了解并

不总是很自觉和采取批判的态度。但是，既然我们现在已经谈到向社会主义方向变革的形式和问题，我想我们的讨论的题目还可以再广泛一些。我们不能忘记，尤其是对那些并未用大部分时间从事社会主义斗争的人来说，还有一个重要问题：究竟为什么要做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什么要为社会的社会主义变革而奋斗？至少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多数人毕竟享有比过去满意得多的生活水平，难道资产阶级社会不可能改进还是改进得不够呢？

那：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由，曾经有过一段时期思想是不明确甚至混乱的。近几年来事实本身引导我们全面回顾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和资本主义特有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矛盾。五十年代是资本主义“奇迹”般发展的黄金时代，当时几个马克思主义作家和其它一些社会主义作家提出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状况的某些方面和对资本主义发展更加“异化”的某些方面的回答。我认为他们促使人们注意一个重要问题，注意社会主义问题的一个重要领域。然而，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有关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有节奏地持续上升，劳动力就业和消灭落后地区等问题，可以由新资本主义提供解决办法或某种保证。而我们现在面临的事实是，资本主义比过去更清楚地表明，它本身不可能充分利用生产能力来保证经济持续均衡地增长，就连西方国家也不能保证解决就业和广大群众物质福利问题，它不可能制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客观矛盾的发展。自然，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来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以外的压力。同时不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受到的挫折，看来是由于它们仍然处在受剥削和从属地位的明显结果。因此，社会主义的必要性，特别是我们在前面谈到的，一种出于集体利益而对整个社

会发展过程进行自觉领导的必要性是越来越明显了。广大群众和青年一代对此已经有所觉悟。如果我们朝着控制基本生产资料，并最终使它们变为集体所有的方向，并沿着人民政府日益深入人心的民主发展道路前进，那么这种自觉的领导就能得到充分发挥。一向被称为人类自由平等社会的社会主义，不应当被看作只是一种老式政治的口头禅。

霍：社会主义兄弟大家庭，我要补充……

那：是的，我们应该从真正克服阶级对立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词的意思。我们应该承认，为自由平等的道德和理想而奋斗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其优越性是不容否认的。

霍：我们又回到了马克思。关于马克思我们谈得不多，不用赘言，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应该指出，现时世界规模的生产社会性和特定集团私人占有财富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和尖锐化。近几十年来，终于发生了空前的世界规模的社会和经济变化。我们甚至可以说，世界大部分地区是在五十年代结束了中世纪状态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许多预言现在开始成为事实。

那：你知道意大利在六十年代末期也出现了一股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感兴趣的潮流，尤其是在青年人中间。这种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愈来愈熟悉的情况，有时真有点象发现或掌握了颠扑不破的真理的味道。然而，这无疑反映了人们愈来愈意识到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和畸形状状态，并进一步意识到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刻程度和可能产生的后果。由于近一个时期危机的加深。回过头去读读马克思的著作，常常会重新发现无价之宝。甚至在最近才第一次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他对几十年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非凡的预见性。

现在有人在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这是事实。诚然，随

着马克思主义重新恢复其影响和力量，我们也觉察到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分析方面存在危机。我们从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工人阶级政党和各种倾向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更加开诚布公和负责的“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就象你在几年前说过的），然而，任何人都不能自封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真正权威的解释者。任何人都无权恩赐或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我这么说当然是想到那些想要取消我党的马克思主义标志的人，但他们可能忘记了我们从来没有，甚至在党章中也没有学究式地阐明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党，也没有阐明我们是马列主义党。我们是一个受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想鼓舞的政治组织，但是我们也吸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入党，我们并且同所有人，甚至同党外人士，公开讨论马克思主义。至于拿我们的政治实践来说，我们正期待有人可以精确地证明为什么说我们的实践是“绝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我这是引用一个作家的话）。我们全党和党的领导集团正在不断抓紧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和研究，并在党内外努力促进它按其本来面目发展，这一点是最根本的。

霍：我同意你的看法。对近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五花八门的论述还有许多可说的，但或许这里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场合。然而，有两点意见看来是恰当的：第一，马克思主义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不是用作引经据典下结论的天书，而是分析现实的工具。从个人来说，我对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倾向持不信任态度，他们用形而上学的分析取代马克思自己当时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努力。第二，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可以对特别复杂的问题作出不同的分析和找出不同的解决办法。用扣上“非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来指责某一个政治运动的做法是毫无意义和危险的。我相信意共也反对

这种将其它共产党革出教门的做法。然而这就涉及了国际主义问题：今天对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认识和执行？

那：对我们这样的党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党是深深扎根于民族现实之中的，但我们也一向不把自己置身于世界革命运动以及世界其它地方民族解放运动和争取民主自由斗争之外。事实上，我们党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它有国际主义的远见和热情。在这方面，我只需要回顾一下越南（在反帝斗争的典型时刻）这一戏剧性事件和史诗，对我们和对六十年代靠拢我们的青年一代的成长具有多大的意义。

我们的国际主义过去和现在一直受到某些方面的指责，甚至受到意大利工人阶级和民主运动内部某些方面的指责，几乎把它说成是不加鉴别地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一视同仁。但是我们的国际主义思想和实践可以从更广泛和完全不同的方面来加以说明。我在前面已经谈到，当涉及利害攸关的共同责任问题，在必要时我们曾多次公开表明不同意其它共产党的立场，我们感到不能只限于表示形式上的团结一致，而实际上掩盖本质上的分歧。我也指出，对以往建设社会主义经验的估价，既不能全盘否定，同时也不能作辩护性的颂扬。

我还想进一步强调我们的国际主义广泛到什么程度。除共产党外，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设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解放运动建立联系，它们中间有些是受马克思主义鼓舞的，有些不是，其中不少国家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目标，但采取的立场和走的道路还是原来的一套。我们已经提出加强同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联系的问题，我们目前正在这样做。我已经强调指出，我们认为我们在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的经验，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概念和实践毫无共同之处。今天参加社会党国际的，有象意大利社会党这样的政党，它公开表示不同意当时占

优势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方针（特别是在冷战时期）；有象法国社会党那样经过深刻改组的党；有内部拥有进步主张和新调研方针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总之，不论这些党的思想立场和观点同我们的分歧有多大，它们是欧洲左翼力量合作进程中的重要成员。

霍：我想缩小一点范围，谈谈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意大利党在陶里亚蒂领导时期曾提出多中心论的思想；然而近十年来，与其说共产主义运动向多中心发展，不如说是朝分裂方向发展。我不敢肯定现在还能不能说有一个世界性的共产主义运动。意共对这种情况是怎么看的？

那：我们曾经毫不迟疑地讲过，在一九六九年世界共产党会议上，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危机。中苏冲突无疑是分歧的主要因素，这种分歧带来了许多严重的后果。后来还有另外一些分歧和不同意见，但并没有因此导致决裂。

现在不应该再用过去的眼光看待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国际已于一九四三年解散。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入党时共产国际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属于另一个历史时期，其特点是团结的形式已经不那么严格，而要广泛和灵活得多。我们必须在不同意见的基础上通过不断争论来求得团结。我指的是政治思想上的不同意见，产生不同意见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客观条件，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各国对理论和政治的发展，以及对争取或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斗争采取不同的方针。因此我认为，我们一方面必须明确地认识到，使中国共产党同其它大多数共产党疏远之类的问题的戏剧性的含义。另一方面也必须考虑到，仍然保存合作关系的共产党各有不同的立场，虽然不是戏剧性的，却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必须承认这一事实。其次，重要的是对不同的立场应该更加开诚布公和始终如一

地进行争论，而不应导致革出教门，应该清除各种可能产生的误解和模棱两可的看法，对悬而未决的问题应坚持进一步讨论的可能性。我认为今天应该这样来考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需要和前景。

**霍：**争论是否也包括诸如同列宁主义的关系等意识形态性质的问题？

**那：**谈到列宁主义问题，我们应该说，这方面的论战和辩论，不只是发生在共产党内，也发生在更广泛的左翼力量内部。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有些人要我们宣誓效忠列宁主义，又有些人要我们放弃列宁主义。我们认为这两种要求都是不能接受的。这不是一个把列宁主义作为不再发展的教条而宣誓效忠的问题。

**霍：**列宁主义这个词甚至还不是列宁发明的。这个词是季诺维也夫创造的，随后被斯大林拣起来的。

**那：**应该反对那种将列宁思想教条化的荒唐做法。这就是我们一直努力在做的工作。我记得陶里亚蒂在一九六〇年写过一篇关于这方面的十分重要的文章，在最近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对列宁和列宁主义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列宁自己就为反对将他的思想变为教条而提供了武器。他在不少场合都明确地要求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合乎本来面貌的分析，摒弃那种满嘴革命口号或抱着本本去找同日常具体问题毫无关联的答案的倾向。这自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从列宁那里学习有关方法论的指示。我们还必须运用他的方法来分析当代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以分清那些仍然有效，那些还有待以后的检验，又有那些则由于最近事态的发展而过时了。他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就是一个例子。

意大利国内外那些对列宁主义的看法同我们有争执的人，



常常对列宁著作采取最庸俗的看法，进行最恶劣的歪曲，简直把列宁当成一个为革命活动开药方的药剂师，一个起义运动的技术顾问，而不是把列宁看成是有权威的、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是任何从事社会主义斗争的人遇到问题时求教的伟大革命导师。目前有人用我们对列宁的分析和方法所采取的根本立场来证明我们是可恶地表里不一，似乎我们摒弃了在民主和民主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上的立场。我们完全意识到我们对民主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概念同列宁的提法是不一致的。这不是由于我们抛弃了列宁的方法，而是由于这个概念有了新的发展，由于历史条件有了很大的不同，这是列宁绝不可能预见到的。

霍：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连社会党人也同你们在列宁主义问题上有所争论。

那：社会主义运动同共产主义运动之间，以及意大利社会党同意大利共产党之间的论战是有历史根源的。这要追溯到五十年或五十多年前的大分裂，以及共产党由于成立第三国际而作出的重要抉择。事实上对列宁主义的抉择在当时标志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和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我们现在应不应该回顾这种抉择在当时的历史意义及其价值和后果呢？这样做总是可以的。但是我认为今天无论社会党人还是共产党人，对列宁的著作、思想和教导，都应采取更为客观的态度。

目前有人过于夸大当时在论战中被称为意大利社会党修正主义这一提法的意义，将它同教条主义对立起来，这种教条主义显然使共产党长期以来对某些马克思主义的、或“正统”列宁主义的信条不去问一个为什么。有人认为我们共产党人除了在五十年代末比社会党晚二十年得出同样的结论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干。这种把争论简单化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我们

两个党的经历要复杂得多。由于我们以列宁主义为基础，并考虑到保存最大的精力来提出我们的原则立场，才使我们没有在政治上采取危险的态度和行动。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在发展理论、战略主张和政治行动方面勇敢地进行创新。

我们在创新的过程中有没有窘困的时候呢？当然有。意大利社会党人在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在提出问题和阐明观点方面有没有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呢？当然有。我们在制订自己的主张时，总是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受到社会党的存在和立场的激励。这种相互影响是不断的和深刻的。至于两党对民主和社会主义问题的共同看法，很难分清楚各自的贡献有多大。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推动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就至今使两党分裂的问题或尚待解决的问题进行讨论，并通过这种方式继续探索解决意大利社会问题的新办法。这一工作应同其它信仰民主的力量共同进行，不管他们是天主教徒还是非教徒。我们共产党人不认为光靠我们自己就能在今天或明天对这些问题提供答案。

## 五

**霍：**由于我们初次谈话为时已久，请你借此机会讲讲你对最近意大利共产党情况的看法。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一九七六年大选。在你看来，这次大选的意义和成果是什么？

**那：**无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在国外，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党在一九七六年大选中取得胜利的特殊重大意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过去从来没有一个能够赢得超过三分之一的选票：在意大利过去几十年来，党的选票一直是不断增长的，但以前的进展是有限的，或者说进展不大。从一九五三年起，经过六十年代，意大利选民的意向在缓慢地转变。而这一次是

一次大转变。这种迹象在一年前，即一九七五年的大区和市镇选举的结果就显露出来了。

可能有人曾以为共产党要想在全国大选中取得类似的结果是相当困难的。可能有人曾认为在一九七五年的大区 and 行政选举时投共产党人票的选民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在议会选举时对于再次投共产党的票会迟疑不决。投票选举全国议会的利害关系更大，这种投票更有决定性意义。一九七六年，我们不但巩固了一九七五年的胜利，而且还在这个基础上前进了。此外，无论是在北部有左倾传统的大区和其它大区，还是在整个南部，赞成票分布的面很广。全国选民清楚地表现出一种希望政治统一和向左发展的趋向。

一九七六年大选的全部结果还不止于此。如果我们忽略这次结果的其它方面，我们就无法理解后来政治形势的发展。这次大选重新肯定了天主教民主党（天民党）作为相对多数派政党的地位，尽管天民党和意共之间的选票差距大大缩小了。

天民党为什么能够重新赢得前一年在大区和行政选举中失去的选票呢？简而言之，天民党成功地利用了一部分选民和中产阶级的反共情绪以及他们的不信任和害怕心理；与此同时，它又成功地使它的选民中最进步的那部分人，对于天主教民主党本身有可能革新和有可能改变其全国政策抱有希望和信心。许多选民都相信天民党在一九七六年会比较愿意赞成过去它所不赞成的并且事实上曾经抵制过的种种改革。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我们的胜利成为大选的一个突出特点；另一方面，在我们同天民党之间形成了一个很难办的政治平衡局面。在天民党新书记的领导下，天民党的立场变得稍微进步一点了，而且部分地改变了党的路线，尽管如此，天民党在竞选运动中仍然作了不同共产党人一

起组织政府的保证。

我们处于一个相当僵持和棘手的局面。有些人在竞选运动期间曾经设想组成一个左翼政府，尽管我们共产党人当时声明，我们认为即使拥有百分之五十一的多数选票，要建立左翼政府既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总之，大选结果打消了这种主张。因为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虽然有了大的跃进）并没有取得百分之五十的选票。甚至没有能够形成天民党和社会党的多数派，因此就不可能组成比过去更左的新的中左政府。由于不仅社会党人反对，共和党人也反对，因此重组四党联合的中左政府的努力宣告失败。最后，我们所提出的由所有反法西斯政党组成全国应急政府的建议（社会党人也提出了这个建议）遭到天主教民主党人的拒绝。这就走进了死胡同，唯一的解决办法只剩下组成天主教民主党少数派的一党政府，这个政府只有依靠其它反法西斯政党的弃权票才能经受住一次信任投票或任何其它的议会危机。

天主教民主党扮演了一个新的角色：它是执政党，但它只能依靠共产党人和其它党的弃权票执政。

我们在议会里首次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内阁总理在投信任票时不采用习惯的说法：“我要求议会投信任票”，而是站起来说：“我要求投信任票和非不信任票”。我们知道，大多数“反对派”，包括共产党人在内都投了弃权票。

在新政府建立之前，进行了一些重大的革新。我们坚持以取消议会对共产党人的陈腐的偏见作为解决政府危机的一项条件。这是继六月二十日大选后我们的第一个重大政治胜利。共产党人公开地参加议会领导。在欧洲，几十年来第一次有一位共产党领袖皮埃特罗·英格拉奥当选为众议院议长，还有其它几位共产党人当选为议会小组委员会的主席。这不仅仅是个威

望问题；它具有实际的重要意义。

六月二十日以后，我们打算强调议会会有必要再度成为重要的决策中心，并使其在反对政府方面掌握更大的主动权和监督权。我们做到了这一点，而且由于我们党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人数增加以及在领导议会活动方面担任了新的职务，使我们能够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一切使得天主教民主党保持一党政府（依靠我们的弃权）的主张更加令人难以容忍。

实际上，在这之后的几个月，我们能够比过去发挥更大得多的主动性和对政府实行更大得多的监督。这也可以说是对于政府危机不正常的解决办法的部分补偿吧。我们不只是作为共产党，而且在同其它民主力量协同一致的情况下，得以通过议会向政府指出应当作出什么选择和决定，甚至常常要政府修改我们不满意的一些决定。自从六月二十日以后，议会里的情况无疑要开放得多了，更有可能对政府的决定展开辩论，更有可能在弃权党与天民党之间达成不同党派间的协议，在政府同以各种方式支持政府的党派之间建立了事先磋商的更加有条不紊的工作方法。但我们也不应当夸大这类协议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协议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

**霍：**你认为当前局势朝党所主张的“历史性妥协”方向推进了多少，当前这种作法同“历史性妥协”有着什么关系？

**那：**首先，我愿意重提一下，在一九七六年大选运动中，我们采取了我认为是相当重要的立场，即使从选举角度讲也是相当重要的。我们讲“历史性妥协”一词，是指我国民主运动和人民运动的主要组成者之间进行长期合作，以保证意大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团结，即共产党、社会党和天主教群众以及同其它有代表性的文化和政治派别的团结，这些派别的目的是要逐步地但是深刻地变革意大利社会。总之，我们提出并且为之

进行宣传的眼前目标是组成一个民主团结政府，这个政府能够在短期和中期内（至少几年内）正视我国的危机，并且能够针对危机所着重暴露出来的一些十分严重的问题，制订和实行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在这样一个政府结束时，所有党派将有可能更好地确定自己的立场并且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道路。此外，通过几年在危机深重时期共同执政的经验，也许会扫清许多障碍，并且（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话）会朝着我们称之为“历史性妥协”的方向为采取某种更为明确的选择开辟道路。这就是我们在竞选运动中说过的：我们阐明了前景并且限定了目标。我认为这样作是有好处的，因为甚至那些出于种种原因对于把“历史性妥协”作为一种长期解决办法持保留态度的人们，也看到了至少在目前这个严重危机阶段需要民主力量重新统一起来。

然而，六月二十日以后，我们连民主团结政府也没有能够建立。相反地，我们面对的是依靠弃权支持的政府这样一种极为奇特和“不正常”的局面。不过，其结果并不意味着各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意共同天民党之间的关系，天主教民主党的一党政府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变化是有的。我们第一次开始认真地讨论执政问题。在我看来，这是符合“历史性妥协”（我使用这个词是因为这个词是我们创造的，它甚至在意大利以外也流行起来了）的逻辑和前景的。

今天在天民党内部存在许多分歧和不稳定的因素。我不是根据老一套做法将天民党分成左派和右派，其部分原因是今天很难说天民党内部什么样的立场算是真正左的，什么样的立场实质上是右的。我们倒是可以说最近现实主义派在天民党内更为突出了。天民党内有一些新的派别和新的人物表现出他们有能力对意大利新的政治现实作出冷静的估计，例如看到意共愈

来愈表现出它在执政方面态度是严肃的，并且是有才干的。可以说，这些现实主义者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是忠诚地支持安德利奥蒂政府试验的力量（因为天民党内部起作用的还有许多其它因素，诸如相互倾轧以及个人和集团的对立）。安德利奥蒂政府在政治上是受到天民党内那些认为需要重视意共力量的增长和主张意共担负更大责任的力量的支持的。

霍：在我看来，意共目前处于一种相当暧昧的地位，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同政府有牵连，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又没有卷入政府。那么，意共由于处于你所说的不正常地位，产生了那些主要问题呢？

那：现在看来十分明显，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政府的政策只能起十分有限的和消极的影响。我们影响今后政府决定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所处的地位，不可能为政府确立一条更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路线作出贡献，我们所处的地位也不可能积极参加实行政府所作的许诺。其结果显然十分难办：我们要为这届政府的产生和维持下去共同负责，但我们不能保证这个政府会制订出所需要的纲领，或者始终如一地贯彻这些纲领，或者在情况需要时作出必要的决定。很清楚，由于几年来我国所遭到的经济、社会和精神危机，整个问题变得严重了。假如局面更正常些，那么，有关我们没有参加政府，没有真正的多数派，施政纲领不解决问题（虽然这个纲领至少是部分地符合我们的要求）等等情况，就不会显得那么严重。相反地，今天意大利危机的复杂和深刻程度，要求人们作出一些十分棘手并且肯定是不得人心的决定，也要求为较长期的计划作出努力。恰恰是在这方面，政府的困难和缺陷最为突出。在这方面，对我们来说也最可能发生矛盾。所以必须采取一些不得人心的决定是因为意大利的通货膨胀率很高，收支方面的结构

性逆差在生产回升时更加增大，以及国家财政处于混乱状态，这种状态反映出寄生现象和补贴增多，从而使我国的全面发展变得十分畸形。

我们曾经想方设法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我们曾经努力指出摆脱以最尖锐形式表现出来的危机的办法。应当承认，我们的解决办法同其它党派的解决办法是一致的，至少同它们的公开声明是一致的，如：需要把资金从消费方面转移到生产投资方面，特别需要减少非必要的个人消费，需要在公共开支方面作出难以作出的选择，改组政府收入的管理和财政制度的管理，更全面地讲，需要改革公共行政和国家结构。

在这些根本点上，各党在理论上是一致的，然而问题是如何在实践中真正把资金从个人消费转移到投资上去（例如，是否要依靠特殊的财政措施），以及在制定出这些措施时如何实现社会公平准则。

过去几个月，我们坚持这些根本点并且取得了部分结果。除此而外，追随我们的那些工人肯定会提出的要求，将更好地保证事情朝着我们所指出的并且得到其它党派赞同的方向发展。光是应急措施是不够的，即使我们设想那些应急措施本身是十分公平的。从这一点来看（还有其它一些看法），如果我们同其它党派一起进入政府，如果我们所处的地位可以对恢复和革新政策的始终如一的发展施加压力和直接作出贡献，那么，劳动群众就会感到他们有了更好的保证。

霍：不过有些人是否会说：“意共没有参加政府，有什么必要为这些不得人心的措施负责呢？意共为什么不依旧作反对派呢？它为什么甘冒失去许多过去投它的票的人以及可能投它的票而对现状不满的人的支持呢？”

那：这个问题讨论得很多，特别是在去年的十月和十一



月。我参加过其中的多次讨论。你可能还记得，一九七六年九月，里拉在市场上突然贬值，我国的财政状况突然恶化。我刚才讲的那些应急财政措施就是在这个时候采取的。我们在许许多多群众大会上同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其它选民进行了讨论。我认为这是我党生活中和我们同群众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关头。这些讨论不那么简单，但是最后我们终于基本上澄清了你刚才提到的那些问题。我们是怎样回答这些反对意见的呢？我们的回答是详尽地分析了我国经济财政危机和经济社会危机。我们说明了危机的严重性并且强调立即对危机进行干预的必要性。我们讲到，我们绝不应当低估危机进一步恶化将会给劳工运动、劳动群众以及民主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如果通货膨胀率超过百分之二十，如果我们的通货膨胀率接近某些拉丁美洲国家的典型通货膨胀率，那就很难说意大利的政治局势会恶化到什么程度了。此外，我们解释说，如果我们的收支逆差再增加，如果我们的外汇收支情况恶化，我们就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外国贷款——而这种贷款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借到手，并且将会给我国的民族独立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相信一旦工人阶级（追随我们的工人们）认识到危机的深度和不能再让它恶化到危急程度的必要性时，他们也就更加理解我们的态度。实际上，我们所强调的第二点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在这样的局势下是否仅仅因为不允许我们进入政府而可以袖手旁观呢？在六月二十日大选之后，那种认为我们应当仍旧作反对派的主张已无法再受到考验。因为如果我们决定作反对派，就会没有多数派，也组不成政府。那就只能立即举行另一次大选，而这种大选将会在更为危险的政治局势和越来越严重的经济、财政和社会局势下举行。

我们坚持了上述主张，在一九七六年最后几个月，我们获

得了我们的党员积极分子和选民越来越大的支持。我们所选择的作法不是跟在现政府政策后面亦步亦趋，而是从一种自主立场上本着批评的态度同现政府对峙。党的这种作法是对于立刻采取措施以应付危机（在今天而不是明天）的必要性担负全部责任。必须阻止危机进一步恶化。应当采取步骤逐步战胜危机。

霍：但是事实上最近几个月，比如说，在工会内部或者在你们同学生和其它团体的关系上，有没有出现什么特殊困难呢？

那：出现了。在工会内部、在工会同工人的关系上，同时在工会同各个党派（包括我们党在内）的关系上，出现了许多困难和争议。另一方面，十分重要的是要看到在这几个月中，我们在切实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权利方面是有成就的。应当记住这点。甚至在一九七五年（这是出现严重衰退的一年，工业生产和国民收入的下降情况是战后头几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尽管生产率随同工业生产的下降而大幅度下降，我们的实际工资还是增加了。我们不但使工资水平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而且还做到了使实际工资增长。尽管一九七五年生产活动下降，但我们在维护就业水平方面多半是成功的。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做到，是由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方面，就在一九七五年，规定工资按生活指数自动调整的条款进一步改进了；另一方面，失业保险制度和工会讨价还价的强大力量防止了大批解雇工人，甚至保证了那些无事可作的工人拿到同正常工资差不多的工资。一九七六年，我们又进一步提高了实际工资，尽管通货膨胀水平超过了百分之十六。按生活指数自动调整工资的条款，没有把有些物品的价格上涨完全包括进去（例如，汽油价格就没有包括在生活指数内），这是事实。我们曾经同意对于年工资在八百万里拉（按目前官方兑换率计算，约合九千三百

美元，按实际购买力这个数字还要高一点）以上者全部冻结按生活费用增加工资的作法；对于年工资在六百万里拉以上（约合七千美元），则按上述增加工资作法的百分之五十比例提高工资。总之，这意味着对于大多数收入低于这些水平的工人，我们作到了使他们避免重大牺牲并且也确实为他们争取到进一步的改善。

最严重的问题倒是出现在其它社会阶层：一方面是中等阶层，我们相当合理地要求他们作出一点牺牲；另一方面则是失业者和“没有社会地位的人”，尤其是正在寻找工作的青年和学生，那些高中毕业生和专科学校毕业生。南方和南方问题是这种情况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正如你所知道的，它们是失业问题的中心，也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人”新的增长过程的中心。

最后，在就业工人群众内部也存在可能发生分裂的问题。埃里克，一九七五年秋在我们第一次谈话时，我已经同你讨论过其中某些问题了。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期，巩固和推进工人阶级联盟政策并非易事。这里我想起了葛兰西关于工人阶级的一段话，他说，工人阶级要想巩固自己的领导权，就必须重视他们想要与之建立领导权联盟的那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要作到这点，工人必须准备在经济行会性质的利益方面作出牺牲，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不应当放弃他们的主要作用，那就是在生产场所和其它具有重大决定意义的地方坚持自己的领导地位。

这是我们最近在实践中遇到的一个问题。当我们看到有必要采取非常的财政措施时，我们原可以提出工人阶级不应付出任何代价的主张，也可以相反地为了保持工人阶级的联盟，特别是同中间集团的联盟，提出应当只号召工人阶级作出牺牲的主张。然而，实际上不论在过去和现在，问题都在于建立一种

平衡，根据这种平衡，就不会产生只要求工人阶级作出牺牲而不要求中等阶层也为危机付出代价的主客观条件。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反对目前在工人阶级中确实存在的把危机重担完全放在中等阶层身上的种种倾向。他们的理由是：至今为止，中等阶层一直享有比工人阶级好得多的生活条件。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一方面是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工人阶级和中等阶层（及其它社会阶层）恰当地分担各自应作出的让步；另一方面巩固工人阶级的联盟政策以及巩固整个民主力量阵线。

我们也曾经不得不面对工人阶级内部的宗派主义压力和行会（“经济主义”）倾向。我指的是那种从狭隘和局部的角度看待自己问题的倾向。我们为此感到苦恼。你要知道，在意大利国内，不同工种的工人之间的一些不合理、不平等的现象在增长。必须本着工人运动团结的利益，并且针对我国所面临的危机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工会为了减少有些工人的某些不能加以保护的局部特权而采取了大胆的决定。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最近工会作出决定取消某些工人（如银行雇员、铁路和无轨电车工人以及化学工业的部分工人）所享受的按生活指数自动调整工资的特殊规定。按照这些规定和协议，上述工种所享有的条款比所有其它产业工人所享有的自动调整工资条款都优越。

我应当讲讲行会倾向。行会倾向使人们把自己当作置身于总的经济和社会局势之外的在业工人来对待自己的问题。例如，他们忘记失业现象在这种局势中占有多大的比重，特别是南方的失业现象，以及妇女和青年的失业现象。我们总是这样讲，最近工会最高领导人也一再这样讲，不应当把工会仅仅看成是个保护在业工人的组织（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也应当

把工会看作是个保护失业工人和待业青年的组织。遗憾的是，想使这个观点占上风的努力只获得部分成功。确实，工会在同意需要限制工资增长的同时，大力坚持必须加紧在另一方面提出在业工人的要求，即要求对投资进行控制和发展一种能够保证增加就业的新经济政策。一九七六年重新签订几项主要劳资合同时，工会在有关企业内部的投资方案方面确实赢得了新的权利，并且决心本着增加对南方的生产投资和提高就业水平的目的首先行使这些权利。

不过，我们应当承认，将这些合同付诸实施，真正使上述权利得到确认，以及实际推行这种为投资和就业而斗争的主张，并非易事。由于政府的政策没有一个可供参考的规定，这些事情本身就是十分难办的。何况还遭到各公司的抵制，首先是一些较大的工业企业带头。这些大企业回避同劳工代表讨论投资方案，或者在南方投资或增加就业问题上不愿作出认真的许诺。除了所有这些来自政治方面的或企业方面的客观困难之外，还应当提到的是工人阶级并没有对这些目标和斗争的重要性完全深信不疑。要想避免在业工人同失业者、特别是同南部失业者和青年与学生当中的失业者之间发生隔阂和分裂，这种信念是至关重要的。

霍：在此期间，共产党在一些大区和大城市政府中的影响较前大大增长了。你能否讲一讲，自从我们上次谈话以来，这些大区发生了什么情况？

那：毫无疑问，在共产党人第一次被邀请同其它政党，首先是同社会党一起执政的那些大区和市镇，出现了不少重要的新情况。那些地方和大区在采取新的管理方法方面有了重大的、积极的进展，其目的在于推动更大程度上的民主参政和更易为人接受的行政管理方法。那里为解决许多地方政府机关的

严重负债问题作了不懈努力。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大区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能够从中央政府得到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经费，以及取得对这些权力和经费的更有效的使用权。

当我们考虑一下从都灵到那不勒斯那些大城市的行政管理情况时，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那里的行政管理情况极其糟糕。我想到的是我们在治理这些城市时所遇到的重重困难，我又想到我们在议会里讨论一些全国性重大问题时所遇到的困难，以及我们在同政府的关系上所遇到的困难。最近几个月当我在都灵、热那亚、米兰、比萨、那不勒斯参加一些讨论时，我曾经一度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避免背上过去遗留下来的所有这些沉重包袱呢？”我的回答是：如果我们暂时从当前局势（一种十分艰难、黑暗和动荡不定，充满了危险并且政治上很紧张的局势）中脱身出来，我们就可以说，不管道路多么曲折，我国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统治阶级将逐步被取而代之。新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主要是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主要政党）正在起领导作用，他们在维持困难的平衡的条件下，甚至在向其它更老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作出必要的妥协的条件下，正在成为新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假使情况果真如此，那我们就应当这样来回答：在历史上，一个新的统治阶级无不是在旧统治阶级处于深重危机、旧制度崩溃或腐朽的情况下担负起社会的领导地位的。还没有出现过新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在一切都极为顺利的情况下，取得对社会的领导地位（不论是通过传统的革命形式还是通过和平形式）。这样的事还从未发生过。

今天我们确实面对着历史遗留下来的十分沉重的包袱，而在历史上，正在兴起的新的阶级和社会力量是无法拒绝任何遗留下来的包袱的，他们只能勇敢地承担下来，把它们作为未来

社会变革的一部分。

霍：让我向你提最后一个问题吧。自从我们上次谈话之后，特别是自从马德里的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首脑会议（假使可以这样称呼的话）以后，关于欧洲共产主义，人们谈论很多。与此同时，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了不少国际问题，特别是关于东欧的人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对于意大利共产党改变、修改或者进一步发展其观点起了多大的作用？

那：我认为这两种情况都同我在我们第一次关于意共的谈话中所讲的东西有关。在我看来，似乎我们上次就详细地谈到了西欧共产党需要对共同承担的义务确定某些基本点和需要确定这些党在战略上的共同特点。我们在这方面有了进展。当然，我们可以讨论欧洲共产主义的定义；这个词可以包含许多东西。我想欧洲共产主义的最好的定义就是这是西欧共产党、世界上这个地区的共产党，为了寻求和走上一条社会主义道路而作的有独创性的一贯努力，这条道路将保证充分发扬西欧最优秀的和最高水平的政治与文化传统以及西欧最先进的社会与民主成果。

我还想再说一点。最近，我们看到了一些欧洲以外的共产党，例如日本共产党对于我们的主张有越来越感兴趣的迹象。我们同日本共产党成功地发表了两党联合声明，这个声明包含了我们同西共和法共共同声明中的许多基本点。在我看来，这意味着甚至在欧洲以外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也存在着共同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在象日共这样一个党的战略中，也有某些方面同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战略相似。

关于你的另一个问题，我们力求严肃负责地，而不是哗众取宠地推行我们支持民主原则和支持社会主义国家需要进一步

实行新的民主实践的路线。我们不认为我们必须同意这种论点，即：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严重侵犯个人权利和民主自由的严重事例表示我们的意见，就是一种干涉这个国家内政的不能允许的行为。当这些准则和原则受到威胁时，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明确表示我们的意见和分歧。实际上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对这些国家本身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认为不能很好地解决这类性质的问题正表明这些国家在国内和国际上有严重的弱点。

霍：你还想谈些别的什么来圆满结束这份关于你对意共的看法的补充材料？

那：我只想谈一点：我们并没有一种前途未卜的感觉（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政治行动已经在意大利建立起重要的牢靠的基础），但是我们意识到艰巨性和危险性。我们知道即使坚固的基础和成就也会遭到危险。我们也知道意大利局势可能会出现突然逆转。当然，在国际关系方面也可能会出现倒退；在国际形势缓和方面也有可能出现倒退，这显然将对每个国家，特别是意大利产生严重的影响。即使不出现这种局面，我国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脆弱性也是确实存在的——因此也存在种种矛盾。我们这里的政治和阶级斗争总是极其尖锐的，虽然有时看来是隐蔽的。此外，意大利某些强大的、冷酷的和肆无忌惮的势力在注意这里情况的发展并且力求施加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警惕；我们绝不能上当受骗，也绝不能过份自信——或者更糟糕地持官僚主义的自我陶醉的态度。

我们不能抱任何幻想。我们所取得的和所赢得的一切都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我们必须在这个斗争中日复一日地坚持前进，而不是被推而后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发展我们的民主而不是眼看民主遭到摧毁。